

《東華漢學》第4期；頁213-276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6年9月

日本的漢語史研究之歷史與現狀 ——兼論中日學術交流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陳東輝*

【摘要】

日本學者在漢語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過了中國學者，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鑒。本文結合作者在日本國立福井大學中文專業任教三年的體會從五個方面論述了日本的漢語史研究之歷史與現狀，以及中日學術交流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浙江大學中文系和漢語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關鍵詞：漢語史 訓詁學 音韻學 文字學 日本漢學 中日學術交流

前言

本文結合作者在日本國立福井大學中文專業任教三年，以及多次參加日本中國學會、日本中國語學會、日本中國近世語學會、日本訓點語學會年會的體會，從以下五個方面論述日本的漢語史研究之歷史與現狀，以及中日學術交流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一、

除了中國本土之外，日本的漢語史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多的，約有數百人。他們基本上在各所大學從事漢語教學，但他們研究的內容幾乎涉及漢語史研究的所有領域，在音韻學、方言學、中古近代漢語詞匯和語法、佛經詞匯、古文字學以及中日漢字詞比較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績，乃日本漢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學者關於漢語史研究的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過了中國學者，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鑒。

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大東文化大學、關西大學、花園大學、南山大學、北海道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京都外國語大學、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等是日本漢語史研究者較為集中的大學，科研成果較多，水平較高。

日本的漢語史研究者十分注重研究的基礎工作。在從事某一項研究

之前，他們常常親自動手編制索引、目錄、資料彙編等工具書，太田辰夫、波多野太郎、入矢義高等德高望重的日本漢語史學家都編過這類工具書。在研究風格上，日本學者重考證，重視細小及別人不太注意的問題，並在論著中注重列舉大量的材料來說明問題，頗有乾嘉遺風。如大島正二的《唐代字音の研究》¹分為「研究篇」（共計1,156頁）和「索引篇」（共計766頁）各1冊，前者包括「序論」（含「中國語音韻史的時代區分」、「中國語音韻史上唐代的位置」、「從來の唐代音研究の概觀」、「研究史の回顧と反省」、「本研究の課題と内容」）、「資料」（含「唐代字音研究資料」、「資料概說」以及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出土禮記音殘卷》影印件）、「資料整理の方法」（含「音韻體系の探索」、「反切用字法の調査」）、「資料中所反映的特徵」（含「聲類」、「韻類」、「反切の構造」）、「唐代字音總說」（含「唐代字音の實相と基盤」、「唐代字音の變遷」、「結語」）等5個部分，並附有「音注總表」和「反切上・下字相關表」；後者乃前者所收資料之詳細索引。該書充分顯示出日本學者的治學特色，堪稱日本漢語史研究的典範之作。又如河野六郎的《朝鮮漢字音の研究》²之正文共計210多

¹ 大島正二：《唐代字音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1）。

² 河野六郎：《朝鮮漢字音の研究》（東京：平凡社，1979），載《河野六郎著作集》卷二。本文在論及日本學者的有關漢語史論著時，凡遇到書名或篇名中的の（的）、と（和、與）等簡單明瞭的日語假名時，根據原文照錄；遇

頁，而附錄資料表達240多頁；平山久雄的《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の研究》，也運用大量字表證明自己的論點。有時在中國學者看來很小的一個論題，日本學者也寫成了一本厚厚的專著。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日本漢語史研究者從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乾嘉學派在治學方面的不少優良傳統，但是他們並不僅僅局限於此。他們普遍重視對外交流，對中國內地、臺灣、香港、韓國以及歐美等地出版的漢學論著十分關注，資訊靈通，加上經濟條件遠較中國內地學者優裕，所以有條件大量購買此類書籍，與自己專業相關的論著幾乎竭澤而漁。同時，他們一年中可多次去國外，或合作研究，或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或查閱圖書資料。此外，許多日本漢語史研究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學者)還掌握多國外語。筆者在日本任教期間，曾接觸過多位青年漢語史研究者，他們除了精通漢語之外，還掌握英、法、德、韓、俄、西班牙等國語言中的一門或數門。上述種種，大大開闊了他們的研究視野，促進了日本漢語史研究的發展。

日本學者在訓詁學及古漢語語法學(尤其是近代漢語詞匯、語法)研究領域成績卓著。太田辰夫、香坂順一、入矢義高、波多野太郎堪稱這一領域的泰斗。太田辰夫在漢語史方面的成就以近代漢語語法最為突

到較為難懂的日語時，則譯成漢語。為了便於排版，書名或篇名中的漢字，一律依照中國漢字書寫。

出，著有《中國語歷史文法》³、《中國語史通考》⁴、《中國語文論集》（語學篇·元雜劇篇）⁵、《中國語古典文法》（改訂）⁶等，其中前兩種被譯成中文出版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經常被有關漢語史研究論著引用；第三種收錄〈近代白話文學的訓詁學的研究法——以兒女英雄傳為中心〉、〈關於《紅樓夢》的語言〉、〈關於清代的北京話〉等22篇論文（其中關於語言研究的16篇），與前兩種的內容沒有重複。此外，他還編有《中國歷代口語文》。太田辰夫的論著論證嚴密，用例審慎，資料詳贍，結論精當。以《中國語史通考》為例，該書收錄了他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所發表的與漢語史（主要是語法史）有關的論文，既有像〈上古漢語略說〉、〈唐代文法試探〉這樣的通論性論文，又有如〈《老乞大》的語言〉、〈《兒女英雄傳》的副詞〉之類的論文。誠如該書中譯本的「內容提要」所云：「著者對於每個歷史時期的語言現象的研究與發掘，均以對專書的語言研究為堅實的基礎。」

《中國語歷史文法》初版於1958年，深入研究了漢語發展史中與現代漢

³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1958）。中譯本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2003年出版修訂譯本）。

⁴ 太田辰夫：《中國語史通考》（東京：白帝社，1988）。中譯本江藍生、白維國譯：《漢語史通考》（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⁵ 太田辰夫：《中國語文論集（語學篇·元雜劇篇）》（東京：汲古書院，1995）。

⁶ 太田辰夫：《中國語古典文法（改訂）》（東京：汲古書院，1984）。

語語法有直接關係的語法問題，尤其是對唐代至清代的語言現象作了非常細緻的描寫，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有不少精闢的論斷，堪稱近代漢語語法史的開創之作，至今仍是研究漢語語法史(尤其是近代漢語語法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參考書。此外，他尚有《唐宋俗字譜》等著述。

香坂順一長期致力於明清時期漢語詞匯的研究，《白話語彙の研究》⁷、《水滸語彙の研究》⁸、《《水滸》語彙と現代語》⁹收錄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水滸語彙の研究》乃其多年研究近代漢語的力作之一，對《水滸》中的600多個虛詞逐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科學的分類、細緻的描寫、簡潔的歷史比較，分為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和助詞五個部分。該書參照《水滸》的各種版本，廣泛吸取了中國、日本漢語學家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近代漢語理論著作。此外，該書還可以作為近代漢語虛詞工具書來使用，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水滸》語彙と現代語》則聯繫現代漢語，對《水滸》中的實詞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並作了簡潔的歷史比較，以揭示出從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實詞的演變規律，在詞匯史研究方法論上具有重要價值。此外，香坂

⁷ 香坂順一：《白話語彙の研究》（東京：光生館，1983）；中譯本名為《白話語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7），江藍生、白維國譯。

⁸ 香坂順一《水滸語彙の研究》（東京：光生館，1987）；中譯本名為《水滸詞彙研究——虛詞部分》（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植田均譯，李思明校。

⁹ 香坂順一：《《水滸》語彙と現代語》（東京：光生館，1995）。

順一還於1961年組織了清末文學言語研究會(1962年改稱明清文學言語研究會)，發行會刊，並在會刊上連載〈近世語割記〉。這個研究會後來發展為日本中國近世語學會¹⁰，如今擁有會員百餘人，每年舉辦一次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並出版會刊《中國語研究》，成為日本兩大漢語研究團體之一(另一個是日本中國語學會)，為日本近代漢語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波多野太郎曾任日本中國語學會理事長。他曾在《橫濱市立大學論叢》上連載〈中國小說戲曲語彙研究提要〉。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他編了大量與訓詁學研究有關的資料叢刊和索引等工具書。他所編的《白話虛詞研究資料叢刊》，收錄江戶時代以來日人編纂的註釋中國小說、戲曲、詩歌中的白話虛詞的著作。同時，他還編有《中國語學資料叢刊》、《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中國方志所見方言彙編》、《吳下方言考索引》等。此外，他於1960年發表的〈增訂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讀後〉一文，高度評價了蔣禮鴻所著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稱頌該書是「研究中國通俗文學的指路明燈」。

入矢義高亦係近代漢語研究的權威學者，尤為擅長于敦煌變文、禪宗語錄、元曲的語言研究，其成果以單篇論文和譯注為主。他早在上個

¹⁰ 日本所謂的中國近世語，一般是指唐五代宋元明時期的漢語，而近代漢語一般是指清代的漢語，與中國學術界所謂的近代漢語的概念(一般是指隋唐至清中葉的漢語)有所不同。

世紀40年代就發表過〈關於近代俗語辭典編纂的資料〉等論文。20世紀50年代初，他與吉川幸次郎、田中謙二合注的《元曲選釋》，對於近代漢語詞彙研究貢獻頗大。同時，他還有《洛陽伽藍記》等譯注，另外還編過《《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彙索引》等。此外，他在20世紀50年代就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和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所撰寫的書評，曾經在日本和中國漢語史研究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空花集——入矢義高短編集》¹¹收入了他的〈語錄的語言與文體〉、〈中國口語史の構想〉、〈白話文と白話小説〉等論文。此外，他還有〈禪宗語錄的語言與文體〉、〈禪語談片〉等論文。

鳥居久靖主要從事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有專著《《金瓶梅》歇後語研究》¹²，另有《《兒女英雄傳》集諺初稿》、《《西遊記》中的歇後語考釋》等著作以及〈明治時期中國小說字典〉、〈日本中國語學史稿〉、〈日本對中國語學遺產的整理〉等論文。

宮田一郎雖然主要從事現代漢語及吳方言研究，但也有不少論文與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有關，如〈關於《紅樓夢》的語言〉、〈《儒林外史》的語言〉、〈《金瓶梅》的語言〉、〈《海上花列傳》的語言〉等。

長田夏樹在近代漢語詞彙和語法領域也頗有成績，發表過〈元代的中蒙語彙對譯《至元譯語》〉、〈中唐詩人白話詩中的語彙〉、〈《游

¹¹ 入矢義高：《空花集——入矢義高短編集》（東京：思文閣出版，1992）。

¹² 鳥居久靖：《《金瓶梅》歇後語研究》（東京：光生館，1972）。

仙窟》文法稿案)、〈《董西廂》文法筆記〉以及〈魏志倭人傳譯音的音值〉、〈作為中國語學史資料的新羅末高麗初海東禪師塔碑銘〉、〈新羅文武王陵碑文初探〉等論文。

金岡照光所著的《佛教漢文の読み方》¹³，包括「佛教史上の『漢文教典』の意義」、「中國語史上の『漢文教典』の意義」、「教典の言語」、「佛教漢文の特殊な構造」、「漢文教典の特殊な句型」、「漢文教典の語彙」、「漢文教典と口語語彙」、「漢文教典と漢字音」、「漢文教典讀解實習」等章節。

牛島德次所著的《漢語文法論》，分為〈古代編〉和〈中古編〉，引用了《史記》、《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世說新語》等典籍中的大量材料，說明了古代和中古漢語的結構，具有重要價值。其中〈中古編〉還附有1970年之前中日兩國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論文目錄和有關索引。此外，他還著有《日本中國語文法研究史》¹⁴。該書是第一部研究內容較為系統和全面，考察時間較長的日本漢語語法研究史專著。此外，他與香坂順一、藤堂明保合編的《中國文化叢書·言語》¹⁵，包括〈上古漢語の音韻〉、〈上中古時期音韻史上的諸

¹³ 金岡照光：《佛教漢文の読み方》（東京：春秋社，1978）。

¹⁴ 牛島德次：《日本中國語文法研究史》；中譯本名為《日本漢語語法研究史》（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甄岳剛編譯，楊學軍校訂。

¹⁵ 牛島德次、香坂順一、藤堂明保合編：《中國文化叢書·言語》（東京：大

問題〉、〈中古漢語の音韻〉、〈漢語文法論の諸問題〉、〈文法研究の略史〉、〈古典語の語法〉、〈古典語の語彙〉、〈中古漢語の語法と語彙〉、〈近世・近代漢語の語法と語彙〉等專題論文，對於瞭解到那時為止的日本的漢語史研究之成果與水平具有重要價值。

鈴木直治所著的《中國古代語法の研究》¹⁶，乃其50餘年研究成果之結晶。該書包括「發話の重點と強調の表現」、「主要虚詞の消長」、「古代漢語中指示詞の體系」、「其他」等4個部分。該書通過豐富的使用例來說明古代漢語語法的特點。除了古代漢語語法之外，他對近代漢語語法也頗有研究，先後發表了〈用於比較的「還要」〉、〈從「可」向「可以」的發展〉、〈用「有」表示強調〉、〈「在」的語法機能的發展〉等論文。此外，他還著有《中國語と漢文》¹⁷等。

鳥井克之所著的《中國文法學說史》¹⁸，是外國學者撰寫的首部漢語語法學史著作，分「基本語法文獻的解題和評論」、「基本語法範疇研究演變過程的考察」兩大部分論述了漢語語法研究之發展歷程，並提出了自己對漢語語法學史分期問題的看法。

內田道夫也曾涉足中古漢語語法領域，先後發表過〈中世中國語

修館書店，1967）。

¹⁶ 鈴木直治：《中國古代語法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4）。

¹⁷ 鈴木直治：《中國語と漢文》（東京：光生館，1975）。

¹⁸ 鳥井克之：《中國文法學說史》（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

「得」の特殊性質〉、〈中世中國語の疑問句〉、〈中國語の命令と商量〉等論文。

上野惠司也曾經從事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先後發表了〈《朱子語類》中帶「子」尾的名詞〉、〈關於元曲中出現的連詞〉、〈關於元曲中出現的「將」〉、〈《水滸傳》與《金瓶梅》重複部分的語言比較〉等論文。

此外，西田太一郎著有《漢文の語法》¹⁹、《漢文法要說》²⁰等。

日本中青年一代的學者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的優良傳統，在訓詁學及古漢語語法學領域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佐藤晴彥主要從事近代漢語的研究，尤其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三言》中的哪些作品為馮夢龍的創作。他將最普通的常用詞匯、語法作為斷代的標準，而不是以很難懂的特殊詞匯作為斷代的標準。因為他認為特殊詞匯數量少，而且容易被有意地模仿。這是很有見地的，值得訓詁學研究者思考。

鹽見邦彥在唐代俗語詞研究領域取得了重要成績，他的論文集《唐詩口語の研究》²¹，包括〈唐詩俗語新考〉、〈全唐詩「戶」考〉、〈全唐詩「市」考〉和〈唐代の「夜市」〉等論文。

志村良治的專長是中古漢語語法，同時對漢語音韻學及詞彙學也有

¹⁹ 西田太一郎：《漢文の語法》（東京：角川書店，1980）。

²⁰ 西田太一郎：《漢文法要說》（京都：朋友書店，1997）。

²¹ 鹽見邦彥：《唐詩口語の研究》（東京：中國書店，1995）。

較深的造詣。他主張在有限的資料中，調動一切手段，來探明各式各樣變動著的語言現象及其內在的變化規律。他往往把語法問題跟語音和詞匯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故其論著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結論也大體穩妥。其名著《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²²分為「中世漢語的語法和詞匯——概論」、「專論」兩個部分。他在該書中指出，漢語史上的中世時代，或稱「中古漢語」，就整體而言有其自身的統一性，相對於它前後的時代，可以說顯示出被充分認可的特殊性。中古漢語與前代的上古漢語有明顯區別的特徵，同時作為近代漢語中發達的各種傾向的先驅，近代漢語中也多少保留著一些中古漢語的要素。中古漢語意外豐富地包含了現代漢語仍通用的語言現象的主要點，在音韻、語法、詞匯各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少現代漢語的祖型乃至原型，從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古漢語形成了漢語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該書乃著者多年研究漢語語法史的成果，考證精細，引例非常豐富，並在附錄中詳述前人觀點，甚便讀者。正如小川環樹在該書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樣：「由於他充分把握了這個時期的語法史的全貌，才能寫得這麼好。」

植田均主要從事近代和現代漢語的詞匯、語法學的研究。他與中國學者俞光中合著了《近代漢語語法研究》²³。此外，他還有《《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的語言》（合著）、《《醒世姻緣傳》的語言》、《《金

²² 志村良治：《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東京：三冬社，1984）；中譯本由江藍生、白維國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²³ 植田均、俞光中合著：《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瓶梅詞話》詞語匯釋》、〈《水滸傳》用於句末的「在那裏」〉、〈《水滸傳》的被動表現〉、〈《金瓶梅詞話》的禁止否定〉、〈現代漢語中繼承的《醒世姻緣傳》的同音假借語〉等論著。

森野繁夫等編纂的《六朝古小說語彙集》、藤井守編纂的《三國志語彙集》和《三國志裴氏注語彙集》、星斌夫編纂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語彙》和《中國社會經濟史語彙續編》、日本宋代以來的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語彙研究班編纂的《明清時代社會經濟語彙索引》等專門詞匯集，對訓詁學亦頗有用處。同時，森野繁夫還發表了〈簡文帝的詩中所見到的「自」——以「本自」為中心〉、〈六朝漢語の疑問文〉、〈六朝漢語の研究——關於《高僧傳》〉、〈六朝漢語の研究——以《與平原書》為例〉、〈六朝譯經の語法〉、〈六朝譯經の語彙〉、〈六朝譯經の語法と語彙〉、〈六朝語辭雜記〉等一系列關於中古漢語詞匯、語法研究的論文。此外，服部四郎發表了〈中古支那語的研究〉、〈中古漢語と上代日本語音〉，辛島靜志發表了〈《長阿含經》的原語的研究——以音寫語分析為中心〉、〈《道行般若經》與「異譯」的對比研究〉、〈漢譯佛典の漢語と音寫語の問題〉、〈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和〈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二)〉，長尾光之發表了〈中國語譯《百喻經》の言語〉、〈中國語譯《雜寶藏經》の言語〉和〈中國語譯《生經》の言語〉，伊藤文發表了〈六朝漢譯佛典の語法その一「將+否定詞」〉、〈六朝漢譯佛典の語法その二「了+否定詞」〉、〈漢魏晉南北朝譯經史語法——完了體「了」〉和〈關於漢譯《生經》的語法〉，西谷登七郎發表了〈六

朝譯經語法の一端》，佐藤利行發表了〈六朝漢語の研究——王羲之の書翰の場合〉、〈六朝漢語の研究——東晉・王獻之の書翰の場合〉和〈六朝漢語の研究——西晉・陸雲の書翰の場合〉和〈被動形「為～所～」式討論〉，井上一之發表了〈關於中古漢語の副詞接尾詞「復」〉和〈《世說新語》中見到的「人」的自稱詞的用法〉，坂井裕子發表了〈中古漢語の是非疑問文〉和〈從「視」到「看」——以《世說新語》的時代為中心〉，松尾善弘發表了〈「見」字考〉和〈「見」字再考〉，田中和夫發表了〈關於中古漢語副詞「無得」〉和〈就《毛詩正義》中副詞「無得」的初探〉，玄幸子發表了〈《生經》語法割記〉和〈關於《賢愚經》中「與」的用法〉，若林建志發表了〈關於《李娃傳》的言語〉、〈關於《南柯太守傳》的言語〉和〈關於唐代傳奇小說中的複音節動詞〉，砂岡和子發表了〈平安古記錄中的唐代口語疑問句〉和〈敦煌出土《字寶碎金》の語彙と字體〉，小池一郎發表了〈關於「不在」的文法〉，小川恒夫發表了〈關於唐詩中的「好+動詞」〉，野間文史發表了〈五經正義語彙語法割記〉，衣川賢次發表了〈《遊仙窟》舊注校讀記〉和〈《遊仙窟》舊注辨證〉。

在國外漢語史學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音韻學往往是其強項。因為國外學者研究漢語史，首先必須過語音這一關，所以一般都在音韻學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有些學者學習與研究了音韻學的基礎知識之後，投入到漢語史研究的其他領域；另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音韻學，最終成為音韻學專家，從而促進了國外音韻學的繁榮與發

展。日本也不例外，音韻學乃日本漢語史研究中成就最為突出的一個領域，湧現出一大批老、中、青學者。

在老一輩學者中，大矢透由於出版了《假名源流考及正本寫真》（1911）、《周代古音考》（1914）等論著，在音韻學和日本漢字音研究領域的傑出成就，而於1916年榮獲在日本學術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學士院恩賜獎。後藤朝太郎於1938年出版了《漢字音の系統》，倉石武四郎的博士論文是《段懋堂の音韻學》²⁴，岡井慎吾曾著有《玉篇の研究》²⁵，服部四郎曾著有《中原音韻の研究》²⁶。

滿田新造乃近代日本漢學界從事漢語音韻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早在1915年就出版了研究中國古代音韻史的專著——《支那音韻の歷史的研究》（又名《支那音韻斷》）。他的代表性論著都收在《中國音韻史論考》²⁷一書中。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中所收的《評高本漢支那古音研究的根本思想——再論音韻研究的方法》一文，對當時流行的被譽為西方漢學研究豐碑的瑞典著名學者高本漢的音韻學研究進行了批評。他認為高本漢的研究存在以下一些問題：1、高本漢認為《切韻》音在中國各地通行，近代音都是從《切韻》派生而來。事實並非如此。2、高本

²⁴ 倉石武四郎：《段懋堂の音韻學》（東京：均社之會，1974）。

²⁵ 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3）。

²⁶ 服部四郎：《中原音韻の研究》與藤堂明保合著（東京：江南書院，1958）。

²⁷ 滿田新造：《中國音韻史論考》（東京：武藏野書院，1963）。

漢認為《切韻》乃根據隋代一方音而成。實際上是參考了南北方語音和古代音而成的。3、雖說是研究古音，但所作的音表等，是根據宋以後的音圖，所以高本漢的研究實際上只是近世音的研究。4、高本漢多根據推論來討論音韻的變化，而所據的理論是印歐語系的法則，對於漢語本身的法則未能研究。5、高本漢的論述多作全稱判斷，難以接受。6、對高本漢所作的三、四等音的區別，有不同意見之處。7、對高本漢所定的音值，也有一些不同看法。²⁸

由於有坂秀世既是日本國語學者，又從事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因而常常能從日本語音史的角度對漢語音韻史的研究作出獨特的貢獻。他的《上代音韻考》²⁹一書中的「漢字音」（即「古代中國語的音韻組織」）部分，以高本漢的學說理論為主要參照，探討漢字音與漢語中古音考訂之間的關係。該書批評高本漢使用了二手漢字音資料，而且又是不完全可靠的漢字音資料。此外，有坂秀世認為，在高本漢《切韻》音語音構成的研究中，日本漢音和吳音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高本漢又將這種日本漢音和吳音作為推定日本古代音節、音值的根據，也讓人懷疑是否陷入了循環論證之結局。有坂秀世的這個思考也是值得注意的。有鑒於此，有坂秀世在研究漢語中古音時，使用日本漢字音資料是十分謹

²⁸ 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三部《轉折和發展（1945-197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537。

²⁹ 有坂秀世：《上代音韻考》（東京：三省堂，1955）。

慎的。³⁰再有，他的論文集《國語音韻史の研究》（增補版）³¹中收有《評高本漢的拗音說》一文，先于中國學者注意到被高本漢忽視了的“重紐”問題。

大島正健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從事《韻鏡》的校訂和研究。他著有《支那古韻史》³²、《韻鏡音韻考》³³、《韻鏡新解》³⁴、《韻鏡と唐韻廣韻》³⁵、《改訂韻鏡》³⁶、《漢語吳音の研究》³⁷、《音韻漫錄》³⁸等書。《漢語吳音の研究》一書以日語中保留的吳音為基礎，研究了中古漢語的發音問題。

河野六郎既研究漢語音韻學，也從事朝鮮語的語音、語法史及一般語言學的研究。他的論著幾乎都收入《河野六郎著作集》³⁹，其中的第二卷為《中國音韻學論文集》，收有〈玉篇反切の音韻研究〉、〈中國

30 參見李無未：〈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語中古音關係的研究〉，《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31 有坂秀世：《國語音韻史の研究》（東京：三省堂，1957）。

32 大島正健：《支那古韻史》（東京：富山房，1929）。

33 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東京：啟成社，1912）。

34 大島正健：《韻鏡新解》（東京：松雲堂，1926）。

35 大島正健：《韻鏡と唐韻廣韻》（東京：松雲堂，1926）。

36 大島正健：《改訂韻鏡》（東京：啟成社，1912）。

37 大島正健：《漢語吳音の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31）。

38 大島正健：《音韻漫錄》（東京：內外出版協會，1898）。

39 河野六郎：《河野六郎著作集》（東京：平凡社，1979 - 1980）。

音韻學と朝鮮〉、〈慧琳眾經音義の反切の特色〉、〈關於《廣韻》這部韻書〉、〈漢字音及其傳承〉、〈《東國正韻》と《洪武正韻譯訓》〉、〈再論《東國正韻》〉、〈關於日本吳音〉、〈朝鮮漢字音的一個特點〉、〈朝鮮漢字音と日本吳音〉等。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及的他的專著《朝鮮漢字音の研究》利用《訓民正音》等十幾種古代資料，分緒論、資料、總論、聲類、韻類和結論六個部分，詳細論述了朝鮮漢字音與中古漢語音韻之關係，對於進一步研究中古漢語音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該書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研究朝鮮漢字音問題的最高水平。此外，他還著有《文字論》⁴⁰等。

水谷真成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尤其是梵漢對音的研究。他精通梵語，並對西域各種語言有相當瞭解，所譯注的《大唐西域記》質量甚高。他研究中古漢語音韻，經常聯繫梵文的資料，成績卓著。《中國語史研究——中國學與印度學的接點》⁴¹收入了水谷真成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發表的24篇重要論文，包括〈唐代漢語鼻音聲母的非鼻音化過程〉、〈曉、匣兩聲母的對音——大唐西域記夷語音釋稿之三〉、〈論漢譯佛典的特殊待遇表現——譯經語彙零拾之一〉、〈表示梵語音的漢字中聲調的功能〉、〈表示梵語「捲舌」母音的漢字——二等重韻和三

⁴⁰ 河野六郎：《文字論》（東京：三省堂，1995）。

⁴¹ 水谷真成：《中國語史研究——中國學與印度學的接點》（東京：三省堂，1994）。

四等重紐〉、〈上古中古音韻史上的諸問題〉、〈《慧琳音義》雜考〉、〈慧琳の言語系譜〉、〈《慧苑音義》音韻考——資料的分析〉、〈關於聲明〉、〈陸法言《切韻》〉、〈佛典音義書目〉等。在上述論文中，他利用眾多的梵漢、藏漢對音資料，對唐代語音進行了系統的共時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其中利用隋代智通至唐代慧琳的大量音譯漢字論證唐代非鼻音化過程，對《慧苑音義》音韻的周詳考證，對慧琳作為北天竺系轉寫漢字對音系統的全面考察，通過《大唐西域記》夷語音釋研究曉、匣兩聲母的對音，以《大唐西域記》為例從理論上系統總結音譯漢字音注的有關問題，均堪稱唐代語音研究的典範之作。此外，他還探討了上古到中古之間音韻史上的若干問題，尤其是關於音譯漢字研究及聲調史研究的方法。

上田正的最大成就在於《切韻》研究。他的《切韻逸文の研究》⁴²從多達285種的文獻資料中輯出各家《切韻》的逸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的《切韻殘卷諸本補正》⁴³根據縮微膠卷核對了敦煌切韻殘卷，校正了《瀛涯敦煌韻輯》、《十韻彙編》之舛誤，並補充了尚未發表的殘卷10種。此外，上田正尚有〈《切韻》傳本論考〉、〈《切韻》諸本反切綜覽〉、〈論全本王仁煦《切韻》〉、〈陸法言《切韻》輯佚〉、〈關於蘇聯所存的《切韻》殘卷〉、〈論新撰字鏡的《切韻》部分〉、〈東宮《切韻》論考〉、〈玄應反切綜覽〉、〈《玄應音義》諸本論考〉、

⁴² 上田正：《切韻逸文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4）。

⁴³ 上田正：《切韻殘卷諸本補正》（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刊行委員會，1973）。

〈慧琳反切綜覽〉、〈慧琳音論考〉、〈關於慧琳音的韻部通用的統計研究〉、〈希麟反切綜覽〉、〈《玉篇》殘卷論考〉、〈《玉篇》佚文論考〉、〈《玉篇》反切綜覽〉、〈有關唐代語音清濁的一份資料〉、〈論中古漢語的三等韻〉等論著。

藤堂明保的研究領域包括漢語音韻學、詞源學以及中國文學、思想諸方面。他著有《中國語音韻論及其歷史的研究》⁴⁴、《中國語學論集》⁴⁵、《漢字語源研究》⁴⁶、《漢字語源辭典》⁴⁷、《中國語概論》⁴⁸、《漢語と日本語》⁴⁹等。此外，他還曾與服部四郎合著《中原音韻の研究》⁵⁰，與小林博合著《音注《韻鏡》校本》⁵¹。《中國語音韻論》堪稱他在音韻學領域的代表之作。該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日本所特有的中古時期的寫經、日本的漢字讀音、假名注音等資料，並吸收了高本漢等人的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以重建中古漢語音韻體系。

小川環樹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及中國文學的研究。其論文集《中國

⁴⁴ 藤堂明保：《中國語音韻論及其歷史的研究》（東京：江南書院，1957）。

⁴⁵ 藤堂明保：《中國語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⁴⁶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研究》（東京：學燈社，1963）。

⁴⁷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辭典》（東京：學燈社，1965）。

⁴⁸ 藤堂明保：《中國語概論》（東京：大修館，1979）。

⁴⁹ 藤堂明保：《漢語と日本語》（東京：秀英出版，1969）。

⁵⁰ 藤堂明保、服部四郎：《中原音韻の研究》（東京：江南書院，1959）。

⁵¹ 藤堂明保、小林博《音注《韻鏡》校本》（東京：木耳社，1971）。

語學研究》⁵²包括〈音韻史考說〉、〈語形と語義の變化〉、〈文字學と字書の研究〉、〈紹介と批評〉等四大部分，收入了〈反切的起源及四聲、五音〉、〈你と爾と日母の成立〉、〈等韻圖と韻海鏡原——唐代音韻史の一側面〉、〈唐詩の押韻——韻書の拘束力〉、〈《詩經》異文的音韻特點〉、〈蘇東坡古詩用韻考〉等論文。此外，他所著的《唐詩概說》⁵³中，有〈唐詩の語法〉一章。

賴惟勤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的研究。他關於音韻學的論文大多收入《賴惟勤著作集》第1卷《中國音韻論集》⁵⁴，包括〈關於上古漢語喉音韻尾〉、〈漢音之聲明及其聲調〉、〈中國音韻史上的爭論點〉、〈關於清朝以前的協韻說〉、〈上古漢語舌音韻尾諸部的分部問題〉、〈段玉裁的異平同入說〉、〈關於段玉裁的古音第十二部〉、〈關於上古漢語韻母的兩三個問題〉、〈關於上古韻母〉、〈台堆都音變考〉、〈關於《切韻》〉、〈中古漢語的喉音韻尾〉、〈關於內轉、外轉〉、〈關於中古漢語的內、外〉、〈日本的漢字音〉和〈作為漢語聲調史資料的佛教音樂〉等。其中最前面的兩篇論文最有價值。〈關於上古漢語喉音韻尾〉作於1953年，曾對李方桂的上古音學說產生了很大影響。該文曾被譯成中文，以〈賴惟勤「合口性喉音韻尾說」簡介〉之題刊佈于《語

⁵² 小川環樹：《中國語學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

⁵³ 小川環樹：《唐詩概說》（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

⁵⁴ 賴惟勤：《中國音韻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9）。

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⁵⁵。〈漢音之聲明及其聲調〉作於1951年，是有史以來對晚唐漢語聲調調值的第一次精密考查，其結論十分可信。⁵⁶該文已被譯成中文，發表於《南大語言學》第一編。⁵⁷此外，賴惟勤還著有《中國語學史講義》⁵⁸。

三根谷徹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和越南漢字音的研究，著有《越南漢字音の研究》⁵⁹、《中古漢字音と越南漢字音》⁶⁰等，其中後者榮獲日本學士院恩賜獎，包括〈《韻鏡》と中古漢語〉、〈中古漢語的韻母的體系——《切韻》的性質〉、〈《韻鏡》と越南漢字音〉、〈關於唐代的標準語音〉、〈宋代等韻圖の構成〉、〈中古漢語と越南漢字音〉、〈越南漢字音の研究〉、〈輕唇音化の問題〉、〈關於《韻鏡》的三、四等韻〉、〈關於唐代的標準語音〉、〈《韻鏡》考〉等論文。該書對於中古漢語音韻研究十分有用。

坂井健一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及漢語方言詞匯的研究。他的專著《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經典釋文所引音義考》⁶¹，以《經典釋文》

⁵⁵ 賴惟勤：《語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⁵⁶ 水谷誠、梁曉虹：〈賴惟勤先生傳·賴惟勤先生論著目錄〉，載於《南大語言學》第一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⁵⁷ 賴惟勤：《南大語言學》第一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⁵⁸ 賴惟勤：《中國語學史講義》（東京：大修館書店，1996）。

⁵⁹ 三根谷徹：《越南漢字音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72）。

⁶⁰ 三根谷徹：《中古漢字音と越南漢字音》（東京：汲古書院，1993）。

⁶¹ 坂井健一：《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經典釋文所引音義考》（東京：汲古書院，1975）。

為中心研究了漢語中古音問題。其論文集《中國語學研究》⁶²，深入考察了《經典釋文》、《廣韻》、《韻略》、《集韻》以及宋詞、敦煌變文的押韻等，並研究了《切韻》前後的語音演變歷史，包括〈關於《廣鏡》中的同音同義同字語〉、〈《廣韻》研究——關於增加字〉、〈《廣韻》研究——關於同字異語〉、〈《廣韻》研究——通攝、江攝韻重出字小考〉和〈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反切考——關於陽韻尾類〉等論文。

尾崎雄二郎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專著《中國語音韻史の研究》⁶³以及論文〈古音學中韻尾的設定與音韻特性的「預約」問題〉、〈以段玉裁《六書音韻表》觀察《詩經》合韻〉、〈作為音量的漢語聲母〉、〈漢語聲母的音量所帶來的東西〉、〈漢語喉音韻尾論獻疑〉、〈關於《切韻》的規範性〉、〈關於《切韻》系韻書中韻的排列〉、〈《韻學》備忘（重紐反切非類化論）〉等。此外，他還編有《漢語史の諸問題》⁶⁴。

飯田利行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研究，繼承其師大島正健之業，構擬漢語古韻之體系。他在所著的《日本所存支那古韻研究》⁶⁵一書中指出，作為支那古韻研究資料，可舉出周、秦、漢魏六朝時代的韻文，日本的

⁶² 坂井健一：《中國語學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

⁶³ 尾崎雄二郎：《中國語音韻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0）。

⁶⁴ 尾崎雄二郎：《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

⁶⁵ 飯田利行：《日本所存支那古韻研究》（東京：富山房，1941）。

假名音、梵語佛典音、朝鮮音等等。他認為假名是表音的，不管時間和場所如何，均保持著字音的永久性。該書主要根據日本所存的古書中的有關字音的記錄、佛教典籍中有關的資料、漢籍中的古代典籍等三部分資料，又參考其他書籍300餘種，對上古音進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價值⁶⁶。此外，他還著有《日本殘存中國近世音之研究》、《關於日本佛家傳誦的音韻研究資料》等。

辻本春彥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研究，有專著《廣韻切韻譜》（第三版）⁶⁷依照《音韻闡微》之格式排列《廣韻》的韻圖，各小韻頭字下附有反切，頗便使用。此外，他尚有〈《洪武正韻》反切用字考——關於反切上字〉、〈《洪武正韻》反切用字考——關於反切下字〉、〈論《洪武正韻》的入聲〉、〈論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的反切〉、〈《韻學集成》與中原雅音〉、〈所謂三等重紐的問題〉、〈論日本漢字音——漢音〉等論文。

平山久雄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及現代漢語語音研究，成果甚豐。他在漢語音韻史領域的論文主要包括〈唐代音韻史上輕唇化的問題〉、〈中古漢語の音韻〉、〈切韻蒸、職韻和元韻的音值〉、〈《中原音韻》入派三聲的音韻史背景〉、〈重紐問題在日本〉、〈日僧安然悉曇藏裏關

⁶⁶ 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三部轉折和發展》，（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頁779。

⁶⁷ 辻本春彥：《廣韻切韻譜》（東京：均社之會，1986）。

於唐代聲調的記載〉、〈從歷時觀點論吳語變調和北京話輕聲的關係〉、〈漢語聲調起源窺探〉、〈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的結構特點〉、〈隋唐音系裏的唇化舌根音韻尾和硬齶音韻尾〉、〈中古漢語的清入聲在北京話裏的對應規律〉、〈《集韻》反切上字的聲調分佈及其在反切法上的意義〉等。他的論文有多篇發表於中國學術刊物，如上述後5篇論文分別發表在《中國語文》、《語言研究》、《古漢語研究》、《語言學論叢》和《北京大學學報》。《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已於200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共計收錄著者用中文撰寫的代表性論文17篇，為廣大中國讀者瞭解平山久雄的學術成就提供了極大便利。

大島正二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研究，除了上文提及的《唐代字音の研究》外，另有專著《中國言語學史》⁶⁸和《《辭書》の發明：中國言語學史入門》⁶⁹，以及論文〈論上古漢語的一、二等韻〉、〈《史記索隱》·正義音韻考〉、〈顏師古《漢書音義》の研究〉、〈顏師古《漢書音義》韻類考〉、〈顏師古《急就篇》注音韻考〉、〈《後漢書》音義音韻考〉、〈《晉書》音義音韻考〉、〈論敦煌出土《禮記》音殘卷〉、〈曹憲《博雅音》考〉、〈反映《琵琶記》用韻的元末吳方言〉、〈關於《韻鏡》的撰述年代〉等。

慶谷壽信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敦煌出土の音韻資料〉

⁶⁸ 大島正二：《中國言語學史》（東京：汲古書院，1998）。

⁶⁹ 大島正二：《《辭書》の發明：中國言語學史入門》（東京：三省堂，1997）。

(上、中、下)、〈敦煌出土の《俗務要名林》〉(資料篇)、〈《俗務要名林》反切聲韻考〉、〈中國音韻學史上的一個問題——關於顧炎武的「二合音」〉、〈論附於《玉篇》卷末的《五音聲論》〉、〈濮陽涑《韻學大成》と王文璧《中州音韻》〉、〈韻書の歴史〉、〈佛教文化と中國語學〉等論文。

望月真澄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論上古漢語的之部合口音〉、〈論上古漢語的收唇韻部〉、〈慧琳音義中的反切特徵〉、〈慧琳經音義所據之字書說〉、〈《集韻》劄記〉、〈《集韻》中的吳語的側面〉、〈《中原音韻》的音韻論〉、〈《中原音韻》中的「莊」等合口音〉、〈《洪武正韻》依據方言〉、〈日本吳音的音韻法則〉等論文。

水谷誠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已出版專著《《集韻》系韻書の研究》，另有〈關於陶淵明的破音字、兩收字的押韻〉、〈關於杜甫詩的換韻〉、〈關於韓愈的疑古用韻〉、〈關於「重」的破音的三聲調區分〉、〈關於《經典釋文》中所見的「令」的破音〉、〈《群經音辨》中所見的《集韻》和《經典釋文》〉、〈《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中所見的「吳音」〉等論文。

岡本勳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和中日古代語音比較的研究，有〈關於反切的起源〉、〈關於字母和等韻的成立〉、〈關於《廣韻》的成立和它的性質〉、〈關於四聲的起源〉、〈唐代の聲調〉、〈關於唐代咸、深、山、臻攝的音價〉、〈關於守溫的《韻學》殘卷〉、〈中古音韻學と訓詁注釋〉、〈字音研究と聲訓〉、〈《切韻》以前の字典〉、〈《切韻》

的性質和它的音韻體系)、〈《切韻》の分韻と現實の音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の成立時期〉、〈《顏氏家訓》の音韻觀〉、〈「唐五代西北方音」と日本漢字音〉、〈吳音と唐代西北方言音〉等論文。

花登正宏主要從事近代漢語音韻的研究，有專著《古今韻會舉要研究》⁷⁰，內容涉及《古今韻會舉要》的版本、作者、成書年代、體裁、反切特色、音韻體系以及所引用的《說文解字》等，並附有〈《古今韻會舉要》同音字表〉、〈《古今韻會舉要》總音表〉、〈《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同音字表〉、〈《蒙古字韻》總音表〉、〈《古今韻會舉要》聲母韻音對照表〉。此外，他還發表了〈《古今韻會舉要》考〉、〈《古今韻會舉要》反切考〉、〈《蒙古字韻》劄記〉、〈明代通俗小說《律條公案》の音注〉等論文。

矢放昭文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的研究，有〈《慧琳音義》所收《玄應音義》の一側面〉、〈《慧琳音義》反切の等韻學的性質〉、〈關於《慧琳音義》卷第二七的反切〉、〈《法華玄贊》中所見的《玉篇》等的佚文〉、〈關於《法華玄贊》中所見的反切〉等論文。

松尾良樹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和唐代口語詞的研究，有〈王梵志詩韻譜〉、〈李義山詩韻譜〉、〈關於唐詩中韻的概念——今體詩與古體詩〉、〈幽韻小論〉、〈舌音齒音と重紐問題——中古中國語の五音〉、〈作為音韻資料的《太公家教》——異文與押韻〉、〈廣韻反切的類相

⁷⁰ 花登正宏：《古今韻會舉要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

關)、〈宋刊巾箱本《廣韻》的反切〉、〈關於唐代語彙的文白異同〉、
〈《萬葉集》詞書と唐代口語〉、〈《日本書紀》と唐代口語〉、〈漢
代譯經と口語〉、〈《干祿字書》淺說〉等論文。

佐藤昭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古音與現代方言音之間的關係，有《晚唐
貫休詩押韻上的一個特色》、《中古音と江蘇省方言》、《北京話の口
語音と文語音》、《中古宕江攝入聲字と北京話の口語音》、《中古清
音入聲字と北京話聲調》等論文。

清水史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廣韻》反切小考〉、〈《韻
鏡》と張麟之〉、〈「反切」と「韻圖」〉、〈《切韻》の性質——陸
法言序と切韻音系〉、〈規範と實際——「韻」と「韻書」の分類〉等
論文。

立石廣男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關於郭璞的《爾雅》音〉、
〈關於郭璞的音注〉、〈關於《經典釋文》的直音、反切並記例〉等論
文。

森博達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和中日古代語音比較的研究，有〈中古
重紐韻舌齒音字の歸類〉、〈唐代北方音と上代日本語の母音音價〉、
〈古代の音韻と日本書紀の成立〉、〈關於武玄之《韻詮》的岑韻〉等
論文。

三澤諄治郎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學和中日古代語音比較的研究，他的

《《韻鏡》の研究》⁷¹從日本國語學的角度來深入探討《韻鏡》之形成原理，並重新構擬符合這一原理的等韻圖，即《(新訂)韻鏡》(修補版)。

馬淵和夫主要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他的《《韻鏡》校本と廣韻索引》(新訂版)⁷²將日本現存的各種刊本、抄本進行比較，力圖恢復《韻鏡》的原有面貌。

特別要提到的是，橋本萬太郎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與一般日本學者有很大不同。他于1960年在東京大學修完博士課程，後赴美留學，1965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在美、日大學任教。這樣的學術經歷，使他既具有日本傳統漢學的深厚功底，又充分吸收了西方語言學界的研究方法，堪稱集東西方學術思想於一身，在從事漢語研究時視野開闊，有許多獨到見解，可惜英年早逝。他的主要論著均收入《橋本萬太郎著作集》，其中第一卷是《言語類型地理論・文法》，第二卷是《方言》，第三卷是《音韻》。他能夠擺脫19世紀歐洲語言學的成見，將語言看作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結構連續體，從而將東亞大陸古今南北的語言融於一爐加以研究。他在《言語類型地理論》⁷³一書中，

⁷¹ 三澤諄治郎：《韻鏡の研究》(東京：日本韻鏡研究會，1960)。

⁷² 馬淵和夫：《韻鏡校本と廣韻索引》(東京：南堂書店，1970)。

⁷³ 橋本萬太郎：《言語類型地理論》中譯本名為《語言地理類型學》，餘志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就東亞大陸的語言變化闡述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存在「農耕民型」與「畜牧民型」兩種不同類型的語言。在東亞大陸，「農耕民型」語言佔優勢，它們有不同于印歐語言的獨特的發展道路。他從殷商帝王名稱祖甲、帝盤庚到春秋時代齊太公子孫名稱乙公、丁公的變化，從《詩經》中的「中谷」、「中林」一類詞語，從地名「雞公山」、「城濮」和安徽、湖北以南大部分地區的「雞公」、「雞婆」、「牛公」、「狗母」等說法，以及粵、閩、客家、吳諸方言中的「菜幹」、「人客」、「塵灰」等古今材料推定，早期漢語乃中心語在前，修飾成分在後。此外，余靄芹、遠藤光曉編的《橋本萬太郎紀年中國語學論文集》⁷⁴，收錄日本、中國以及西方學者的論文20餘篇，涉及音韻史、方言學、語法學等方面。

除了上述造詣很深的老一輩學者之外，日本年輕一代的音韻學家也已逐漸成長起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遠藤光曉堪稱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專業方向主要為漢語音韻學及方言學，對《切韻》進行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成績卓著。此外，他的論文〈《中原音韻》的成書過程〉在佐佐木猛〈能以《中原樂府音韻類編》勘正《中原音韻》的錯誤嗎？〉一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比較《中原音韻》與《中原樂府音韻類編》之內容及音韻體系，指出《中原音韻》乃是按《廣韻》依次拾字編

⁷⁴ 余靄芹、遠藤光曉編：《橋本萬太郎紀年中國語學論文集》（東京：內山書店，1997）。

成的《中原樂府音韻類編》一書之增補改訂本，而非周德清直接根據元曲的初期名家之實際作品歸納編撰而成的。他的另一篇論文〈《四聲通解》所據資料的編纂過程〉，將朝鮮李朝崔世珍的《四聲通解》（1517年）與元明時代的中國韻書作了比較研究，從而發現了《四聲通解》中所反映出來的一些稀見的音韻資料。還有，他的論文〈王叔和《脈訣》波斯語譯本中所反映的14世紀初的漢語語音〉，利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所藏的刺失德丁《伊爾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內所含的王叔和《脈訣》中的波斯文對音，整理出《脈訣》中所反映的無入聲韻尾音系和有入聲韻尾音系，為研究14世紀初官話音的實際狀況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他還撰有〈《悉曇藏》の中國語聲調〉、〈關於敦煌文書「守溫韻學殘卷」〉、〈關於《切韻》「序」〉、〈關於《切韻》的韻序〉、〈《切韻》小韻的分層位〉、〈《切韻》反切の諸來源〉、〈關於《切韻》稀少反切上字的分佈〉、〈關於《切韻》唇音的開合〉、〈臻櫛韻の分韻過程と莊組の分佈〉、〈《翻譯老乞大、樸通事》裏的漢語聲調〉、〈《重刊老乞大諺解》牙喉音字齶化條件——附巴黎所藏的朝鮮資料〉、《杭州方言の音韻體系》等論文，編有《老乞大·樸通事研究文獻目錄（初稿）》等。他的論文集《中國音韻學論集》⁷⁵已經出版。遠藤光曉曾主持日本文部省1997 - 1999年度科學研究費資助的大型科研項目“中國的語言地理和人文·自然地理”。此外，他還組織創建了日本漢語史研究會，從1994

⁷⁵ 遠藤光曉：《中國音韻學論集》（東京：白帝社，2001）。

年以來每個月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內容以漢語方言和音韻學研究為主。

平田昌司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中青年音韻學家，他在治學方面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探究漢語音韻學，如他的論文〈《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⁷⁶研究了術數等神秘思想對等韻學的影響，頗有新意。〈胡藍黨案、靖難之變與《洪武正韻》〉⁷⁷一文也是如此。他曾主持日本文部省1993 - 1995年度科學研究費資助的大型科研項目「中國の方言と地域文化」，先後出版了五個分冊的研究成果報告書。該項目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漢語方言置於整個地域文化背景中加以綜合研究。平田昌司在其代表作之一〈雪後天晴的風景——中國語言文化圈的「內」和「外」〉中指出，中國的語言文化從書面語而言是從屬於一個中心的統一的世界（雪被），但是從口語、方言而言則是由內（漢語）向外（非漢語）延續的多元的世界（雪被下的景物），同時還提出了中國東南地區是非漢語完成了漢化過程的區域，西南地區是非漢語和漢語混雜的區域的假說。此外，他還發表過〈「審音」と象數——皖派音學史稿序說〉、〈略論唐以前的佛經對音〉、〈《事林廣記》

⁷⁶ 平田昌司：〈《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與《切韻指掌圖》〉：《東方學報》（京都）第五十六冊（1984）。

⁷⁷ 平田昌司：〈胡藍黨案、靖難之變與《洪武正韻》〉。載於《南大語言學》第二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音譜類「辨字差殊」條試釋〉、〈《刊謬補缺切韻》的內部結構與五家韻書〉、〈反切上字「匹」の一解釋〉等論文。再有，平田昌司還制訂了以水系為綱的「新安江流域語言文化調查計劃」，與中國學者進行合作研究；並與中國內地和香港學者合作開展「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

高田時雄的中古漢語研究與敦煌學相結合，他的《依據敦煌資料對中國語史的研究》⁷⁸乃研究中古漢語音韻、語法之力作，對羅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進行了重要的補正，是敦煌文書中的漢藏對音研究之最新成果。同時，他所編的《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⁷⁹，收有平田昌司〈謝靈運《十四音訓敘》の系譜〉、木田章義〈顧野王《玉篇》及其周邊〉、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錄と行隨函音疏〉等3篇中青年學者的論文。這些論文對有關文獻的背景及其在音韻學史上的地位作了精到的考證，材料翔實，堪稱高質量之論文。他還編有《明清時代の音韻學》⁸⁰，該書是他主辦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音韻史研究班」之報告論文集。此外，他的〈關於慧皎《高僧傳》中所見的特殊語法〉、〈中國語史の研究と敦煌學〉、〈漢語在吐魯番——以《切韻》殘片研究為

⁷⁸ 高田時雄：《依據敦煌資料對中國語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

⁷⁹ 高田時雄編：《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

⁸⁰ 高田時雄：《明清時代の音韻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1）。

專題〉、〈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的《排字韻》筭記〉、〈關於清代官話的資料〉等論文，亦具有重要價值。他的論文集《敦煌·民族·語言》已譯成中文，作為《世界漢學論叢》之一種由中華書局於2005年出版。

小倉肇主要從事中國中古音和日本吳音的研究，其主要論著包括《日語吳音研究》⁸¹以及〈上古漢語的音韻體系〉、〈《法華經》單字反切考〉、〈《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義字音考〉、〈《韻鏡》の術語〉、〈關於韻書〉等。

佐佐木猛編有《集韻切韻譜》⁸²和《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切韻譜》⁸³。

此外，金田一春彥、金澤莊三郎、真武直、城田俊、松本丁俊、讚井唯允、藏中進、古屋昭弘、佐藤進、吉田雅子、吉池孝一、西田龍雄、橘純信、中村雅之、富平美波、工藤早惠、白田真佐子、池田巧、木津祐子、山崎雅人、筱崎攝子、內野雄一郎、森川久次郎、神尾弼春、狩野充德、辻本春彥、沼尻正隆、田川一巳、西上勝、長田夏樹、岩田禮、山口角鷹、木下鐵矢、高橋均、山本岩、柏谷嘉弘、高松政雄、藤井茂利、樋口靖、齊藤茂、林史典、戶崎哲彥等學者，也在音韻學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說文會所編的《中國語音韻研究文獻目錄》

⁸¹ 小倉肇：《日語吳音研究》（東京：新典社，1995）。

⁸² 佐佐木猛編：《集韻切韻譜》（福岡：中國書店，2000年）。

⁸³ 佐佐木猛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切韻譜》（福岡：中國書店，1996年）。

⁸⁴，收錄了到1957年為止的漢語音韻學論著目錄。該目錄不僅僅羅列文獻資料，還注意反映音韻學研究過程中的發展與論爭，頗具價值。

日本的文字學研究歷史悠久，成績卓著。早在一個世紀前，作為日本甲骨文研究開山祖師的林泰輔就發表了〈關於周代書籍的文字及其傳來〉、〈周代の金石と經子史傳の文字〉、〈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牛骨〉等論文。在最後一篇論文中，他詳細論述了甲骨史料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重要價值。1914年，林泰輔以《商代漢字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此後他又出版了《周公及其時代》、《龜甲獸骨文字》等著作。他的《龜甲獸骨文字表》之手稿保存在日本慶應大學斯道文庫，可惜至今尚未出版，僅有其中的兩頁在日本平凡社出版的《書道全集》第1卷中有圖版介紹。

白川靜在中國古文字研究領域成績卓著，著有《說文新義》（15卷）⁸⁵、《金文通釋》（56輯）⁸⁶、《甲骨文金文論叢》（10卷）⁸⁷、《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構造》⁸⁸、《金文の世界：殷周社會史》⁸⁹以及

⁸⁴ 日本說文會所編：《中國語音韻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87）。

⁸⁵ 白川靜：《說文新義》（神戸：白鶴美術館，1969 - 1976）。

⁸⁶ 白川靜：《金文通釋》（神戸：白鶴美術館，1962 - 1984）。

⁸⁷ 白川靜：《甲骨文金文論叢》（京都：朋友書店，1960）。

⁸⁸ 白川靜：《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構造》（東京：平凡社，1972）；中譯本溫天河、蔡哲茂譯：《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的締構》（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

《字統》、《字訓》、《字貫》、《漢字百話》、《文字逍遙》等書。其中《說文新義》根據甲骨史料、金文史料和其他有關出土資料，對《說文解字》進行了全新的考證和解說。自從甲骨文發現以來，孫詒讓、于省吾等中國古文字學家都試圖用甲骨史料、金文史料與《說文解字》進行互證性研究，但白川靜可以說是首位完整地做完這一工作的古文字學家。《金文通釋》原為授課講義，從1962年開始在《白鶴美術館志》上陸續發表。該書體例精當、考釋博洽，顯示出作者廣收慎取的態度。尤其是考釋部分，該書將前人及近現代學者考釋的主要論述幾乎全部引用，近乎銘文匯釋。該書除了銘文考釋之外，尚有金文學史、金文學研究方法等內容以及各種十分有用的索引和圖表，從而使該書既對金文研究進行全面的回顧與總結，又便於學者利用。《甲骨文金文論叢》是一部多達十卷的學術巨著，由單篇考證性論文組成。該書在很大程度上為《說文新義》的撰寫打下了基礎。⁹⁰此外，他還編有《金文集》。

貝塚茂樹與同仁一起於1951年在東京創辦了「甲骨學會」，出版《甲骨學》雜誌，對於推動日本的古文字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曾對京都大學所藏的甲骨片進行了全面而又系統的整理與研究，完成了《京都

⁸⁹ 白川靜：《金文の世界：殷周社會史》（東京：平凡社，1971）；中譯本溫天河、蔡哲茂譯：《金文の世界：殷周社會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

⁹⁰ 參見朱順龍、何立民：《中國古文字學基礎》（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132-134。

大學人文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⁹¹一書。該書是收錄日本所藏甲骨最多、代表當時日本甲骨學研究水平的一部名著。《殷末周初的東方經略考》則是其在金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此外，他還與伊藤道治合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和《甲骨文斷代研究法的再檢討》。貝塚茂樹早期發表的甲骨文、金文方面的論文，有很大一部分收錄在他的論文集《中國古代史的發展》⁹²第一部之中。

島邦男在古漢語文字學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殷墟卜辭綜類》⁹³和《殷墟卜辭研究》⁹⁴這兩部著作之中。前者將63種甲骨著錄中的卜辭逐條按照內容編排，總結出164個甲骨文部首，然後根據卜辭年代，將甲骨單字與稱謂3,397個依次納入到這些部首中去。此前的工具書只能查閱單字，而該書既可以查閱單字，也可以查閱整條卜辭，甚便讀者。中國學者姚孝遂等借鑒《殷墟卜辭綜類》之經驗，編纂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⁹⁵和《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⁹⁶等書。姚孝遂在《殷墟甲骨刻辭

⁹¹ 貝塚茂樹：《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9 - 1961）。

⁹² 貝塚茂樹：《中國古代史的發展》（東京：弘文堂，1946）。

⁹³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東京：汲古書院，1967）。

⁹⁴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日本：弘前大學文理學部中國學研究會，1958）；中譯本溫天河、李壽林譯，（臺北：鼎文書局，1975）。

⁹⁵ 島邦男：《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

⁹⁶ 島邦男：《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類纂》一書的「序」中指出：「這部《類纂》只不過是在《綜類》的基礎上補充了一些新的資料，在文字形體的分類方面重新考慮其分合，增加了隸釋與原篆相對照，僅此而已。體例上基本一仍其舊，只是個別地方稍作調整。」《殷墟卜辭研究》也是總結甲骨學研究成果的巨著之一，資料翔實，價值頗高，堪稱力作。⁹⁷

高田忠周開始研究漢魏晉唐書法，進而研究文字學。《古籀篇》⁹⁸乃其多年研究心血之結晶，曾榮獲在日本學術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學士院獎。《漢字詳解》⁹⁹也是他的力作。此外，他還編有《朝陽字鑒》¹⁰⁰。該書經中國學者汪仁壽增改後，更名為《金石大字典》，由上海碧梧山莊於1926年石印。

岡井慎吾於1916年出版了《漢字の形音義》¹⁰¹。《《玉篇》の研究》¹⁰²乃其博士學位論文，分為前篇和後篇。前篇又分成兩部分，分別論述《玉篇》和《倭玉篇》之源流。前篇對《玉篇》的作者和版本源流等問題作了精細的考證，書中列出了日本所存的各種本子（共7卷）以及刊

⁹⁷ 參見朱順龍、何立民：《中國古文字學基礎》（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134。

⁹⁸ 高田忠周：《古籀篇》（東京：古籀篇刊行會，1925）。

⁹⁹ 高田忠周：《漢字詳解》（東京：名著刊行會，1969）。

¹⁰⁰ 高田忠周：《朝陽字鑒》（日本石印本，1925）。

¹⁰¹ 岡井慎吾：《漢字の形音義》（東京：六合館，1916）。

¹⁰² 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3）。

行情況，並根據各種本子，對《玉篇》原貌進行了深入研究。同時，該書將原本《玉篇》與宋本《大廣益會玉篇》進行對照，分析了宋本的改易情況。此外，該書還將宋本與元本、明本以及《倭玉篇》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列出了它們之間的差異。後篇輯錄了各種典籍中所引用的《玉篇》佚文，約有2千條。作者根據上述佚文，對原本《玉篇》進行輯補，共收列1,588字，後來又追加了203字。這就是後篇中的「內篇」。另外，將349個可能是《玉篇》的字列在後面，作為後篇中的「外篇」。¹⁰³此外，他還著有《日本漢字學史》¹⁰⁴、《說文新附字考證合編》¹⁰⁵、《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箋正》¹⁰⁶等。

日本學者對《玉篇》研究非常重視。除了岡井慎吾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還有上田正的〈《玉篇》殘卷論考〉、〈《玉篇》逸文論考〉、〈《玉篇》反切總覽〉，西宮一民的〈令集解と玉篇〉，森鹿三的〈令集解所引玉篇考〉，井野口孝的〈〈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所引《玉篇》佚文〉、〈大治本〈新《華藏經》音義〉所引《玉篇》佚文〉、〈關於智光〈淨名玄論略述〉所引的《玉篇》〉，井上順理的〈〈令集解〉引《玉篇》佚文考——〈孟子傳來考〉附論〉，西端幸雄的〈原本《玉篇》

¹⁰³ 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頁526-533。

¹⁰⁴ 岡井慎吾：《日本漢字學史》(東京：明治書院，1934)。

¹⁰⁵ 岡井慎吾：《說文新附字考證合編》(東京：六合館，1916)。

¹⁰⁶ 岡井慎吾：《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箋正》(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の出典配列形式〉、〈《玉篇》零卷出典索引〉、〈原本《玉篇》零卷玉篇佚文補正漢字索引〉，高田時雄的〈《玉篇》の敦煌本〉、〈《玉篇》の敦煌本・補遺〉，長澤規矩也的〈原本《玉篇》古寫本斷簡の行方〉，貞荊伊德的〈關於《玉篇》和《篆隸萬象名義》〉，木田章義的〈《玉篇》及其周邊〉，太田齋的〈《玄應音義》對《玉篇》の利用〉、〈《玄應音義》反切と《玉篇》反切の一致〉，小島憲之的〈關於原本《玉篇》佚文拾遺的問題〉，佐藤義寬的〈〈三教指歸成安注〉所引《玉篇》佚文集及其研究〉等。

杉本つとむ編有《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¹⁰⁷，詳見下文。同時，他還著有《漢字入門——《干祿字書》及對它的考察》¹⁰⁸等書以及〈《干祿字書》覺書——關於漢字音的若干考察〉等論文。此外，松尾良樹撰有〈《干祿字書》淺說〉一文。

貞荊伊德著有《新撰字鏡の研究》¹⁰⁹，涉及《玉篇》與《篆隸萬象名義》之關係、《新撰字鏡》之具體研究、《新撰字鏡》與《漢語抄》之關係、《大般若經音義》中卷與《新撰字鏡》之關係、世尊寺本《字鏡》之研究、京大本《字鏡抄》與無名字書之關係、觀智院本《類聚名

¹⁰⁷ 杉本つとむ：《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東京：雄山閣，1983）。

¹⁰⁸ 杉本つとむ：《漢字入門——〈干祿字書〉及對它的考察》（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2）。

¹⁰⁹ 貞荊伊德：《新撰字鏡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義抄》形成之考察、《新撰字鏡》之版本問題等。

福田襄之介主要從事文字學等領域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是《中國字書史の研究》¹¹⁰。此外，他還發表過〈《爾雅》の性質〉、〈關於《說文解字》中的籀文〉、〈《說文解字》說解の諸本〉、〈《說文解字》注釋本の研究〉、〈《說文解字》說解の形式〉、〈《說文解字》與《周易》的關係〉、〈論字書〉、〈關於六書〉、〈關於揚雄《方言》的成立〉等論文。

松丸道雄主要從事甲骨金文學、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他與高島謙一合編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¹¹¹，系統收集了1988年之前世界各地的471位學者的1,904種論著中的甲骨文字釋，總次數多達25,000項。該書根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甲骨文編》¹¹²體例分類編排，各字則按字釋發表年代編排，既可綜覽某字字釋，又可回顧該字研究歷史。此外，該書同時擁有甲骨文字形和楷書字形兩種檢索表。該書的出版，為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極大便利。此外，他還編著有《甲骨文字》、《散見於日本各地的甲骨文字》¹¹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

¹¹⁰ 福田襄之介：《中國字書史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79）。

¹¹¹ 松丸道雄、高島謙一合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¹¹²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¹¹³ 松丸道雄：《散見於日本各地的甲骨文字》。中譯文由劉明輝譯，載於《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所藏甲骨文字圖版篇》、《新編金石學錄》等。

藤堂明保在文字學領域亦頗有成就。他著有《漢字源》¹¹⁴、《漢字の起源》¹¹⁵、《漢字の思想》¹¹⁶、《漢字と文化》¹¹⁷、《「武」の漢字と「文」の漢字》¹¹⁸、《漢字及其文化圈》¹¹⁹、《漢字と日本語》¹²⁰等。

阿辻哲次在文字學研究尤其是普及文字學知識方面成績卓著。他著有《漢字學——《說文解字》の世界》¹²¹、《漢字の字源》¹²²、《漢字の文化史》¹²³、《漢字の社會史》¹²⁴、《漢字史圖說》¹²⁵等。

赤塚忠系著名漢學家。《赤塚忠著作集》的第7卷是《甲骨金文研究》。他在文字學領域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對甲骨文和金文的解讀。

¹¹⁴ 藤堂明保：《漢字源》（東京：學習研究社，1978）。

¹¹⁵ 藤堂明保：《漢字の起源》（東京：徳間書店，1966）。

¹¹⁶ 藤堂明保：《漢字の思想》（東京：徳間書店，1968）。

¹¹⁷ 藤堂明保：《漢字と文化》（東京：徳間書店，1967）。

¹¹⁸ 藤堂明保：《「武」の漢字と「文」の漢字》（東京：光生館，1971）。

¹¹⁹ 藤堂明保：《漢字及其文化圈》（東京：徳間書店，1977）。

¹²⁰ 藤堂明保：《漢字と日本語》（東京：秀英出版，1981）。

¹²¹ 阿辻哲次：《漢字學——〈說文解字〉の世界》（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5。）

¹²² 阿辻哲次：《漢字の字源》（東京：講談社，1994）。

¹²³ 阿辻哲次：《漢字の文化史》（東京：日本廣播出版協會，1994）。

¹²⁴ 阿辻哲次：《漢字の社會史》（東京：PHP新書，1999）。

¹²⁵ 阿辻哲次：《漢字史圖說》（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中譯本高文漢譯：《圖說漢字的歷史》（濟南：山東書畫出版社，2005）。

西原一幸主要從事「字樣學」的研究，有〈關於敦煌出土《時要字樣》殘卷〉、〈關於敦煌出土《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並引正俗釋》殘卷〉、〈關於《顏氏字樣》以前的字樣〉、〈關於杜延業撰《群書新定字樣》的佚文〉、〈唐代楷書字書の成立〉等論文。

中青年學者笹原宏之在日本國字以及漢字與中日文化交流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大成績。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是《國字の位相と展開》。此外，他還發表過〈國字と位相——江戸時代以降の例に見る「個人文字」の、「位元相文字」、「狹義の國字」への展開〉、〈國字の發生〉、〈現代日本の異體字——漢字環境學序說〉、〈關於則天文字的周圍論的性質〉等論文。

日本說文會編、賴惟勤監修的《說文入門——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¹²⁶，包括「許慎の《說文解字》」、「段玉裁の《說文解字注》」、「段注の實際」、「段玉裁の古音十七部說」等4章。高橋由利子所著的《說文解字の基礎的研究》，由6篇論文組成。

佐藤喜代治主編的《漢字百科大事典》¹²⁷，包括「漢字の形」、「漢字の音訓」、「漢字の借音」、「國字問題」、「漢字研究文獻目錄」、

¹²⁶ 日本說文會編、賴惟勤監修：《說文入門——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東京：大修館書店，1983）。

¹²⁷ 佐藤喜代治：《漢字百科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96）。

「漢字關係年表」等內容。此外，佐藤喜代治還編有《漢字講座》¹²⁸。

同時，藏中進著有《則天文字の研究》¹²⁹，井原徹山著有《支那文字解説》¹³⁰，水上靜夫著有《漢字文化源流探究》¹³¹，溝口雄三、富永健一編著有《漢字文化圈の歴史と未來》¹³²，西田龍雄著有《漢字文明圈の思考地圖》，貝塚茂樹、小川環樹編有《中國の漢字》¹³³，林四郎、松岡榮志著有《日本の漢字・中國の漢字》，鈴木修次著有《漢字》，藤枝晃著有《文字の文化史》。

此外，大庭修、池田溫、水上靜夫、伊藤道治、木村秀海、江村治樹、林巳奈夫、田中有、片山智士、宮崎市定、山田俊雄、小川三千雄、內野雄一郎、松尾良樹、加藤常賢、中島壤治、佐藤喜代治、三原研田、立石節子、北村信男、松本信廣、土屋節子、目加田誠、伊東倫厚、森安太郎、一色英樹、柳本實、進藤英幸、鐵井慶紀、西川寧、松尾善弘、久島茂、藤田夏紀、根岸政子、高橋由利子、中前千里等學者，也在文字學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

¹²⁸ 佐藤喜代治編：《漢字講座》（東京：明治書院，1988）。

¹²⁹ 藏中進：《則天文字の研究》（東京：翰林書房，1995）。

¹³⁰ 井原徹山：《支那文字解説》（東京：大東出版社，1940）。

¹³¹ 水上靜夫：《漢字文化源流探究》（東京：大修館書店，1997）。

¹³² 溝口雄三、富永健一編著：《漢字文化圈の歴史と未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¹³³ 貝塚茂樹、小川環樹編：《中國の漢字》（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

六角恒廣著的《中國語書志》¹³⁴以及他編的《中國語關係書書目 (1867 - 1945) 》¹³⁵和《歐米人著作中國語關係書書目》¹³⁶、日本近代漢語研究會編的《中國語・中國語學參考文獻目錄》¹³⁷、中國文學語學文獻案內編集委員會編的《中國文學語學文獻案內》(第四次修訂本)¹³⁸、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研究會中國語學班編的《日本近十年近代漢語研究論文・著作目錄》¹³⁹、渡邊浩司編的《對於近代漢語的研究》¹⁴⁰、鈴木誠編的《《水滸傳》語彙・語法研究文獻目錄稿》(中文1949 - 1990)¹⁴¹、

¹³⁴ 六角恒廣：《中國語書志》(東京：不二出版，1994)。

¹³⁵ 六角恒廣編：《中國語關係書書目 (1867 - 1945) 》(東京：不二出版，1985)。

¹³⁶ 六角恒廣編：《歐米人著作中國語關係書書目》。載於日本《創大亞洲研究》第十四號 (1993/3)。

¹³⁷ 日本近代漢語研究會編：《中國語・中國語學參考文獻目錄》(東京：近代漢語研究會，2000)。

¹³⁸ 中國文學語學文獻案內編集委員會編：《中國文學語學文獻案內》(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1994)。

¹³⁹ 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研究會中國語學班編：《日本近十年近代漢語研究論文・著作目錄》。載於《神戶外大論叢》第四十一卷第四號 (1990)。

¹⁴⁰ 渡邊浩司編：《對於近代漢語的研究》。載於大阪市立大學《中國學志》訟號 (1991)。

¹⁴¹ 鈴木誠編：《水滸傳語彙・語法研究文獻目錄稿 (中文1949 - 1990) 》。載於麗澤大學《中國研究》一號 (1993)。

大島吉郎編的《《紅樓夢》研究文獻目錄——語學編》¹⁴²，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的《東洋學文獻類目》、日本論說資料保存會編印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¹⁴³第二分冊《文學·語學》等書目、書志、資料彙編，均為漢語史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衣川賢次的《禪宗語錄導讀》（1）¹⁴⁴一文，提供了與禪宗語錄研究有關的許多文獻資料及工具書。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汲古書院、大修館書店等出版了許多與漢語史研究有關的高質量著作，為日本的漢語史研究事業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日本中國近世語學會主辦的《中國語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主辦的《中國語學研究·開篇》、日本中國語學會主辦的《中國語學》、日本禪籍俗語言研究會主辦的《俗語言研究》、京都大學主辦的《均社論叢》、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主辦的《人文研究》、東京外國語大學主辦的《中國俗文學研究》，以及《大東文化大學紀要》、

¹⁴² 大島吉郎編：《《紅樓夢》研究文獻目錄——語學編》。載於《大東文化大學創立七十周年紀念論集》（上卷），（1993）。

¹⁴³ 日本論說資料保存會編印：《中國關係論說資料》。該書屬於資料彙編性質，複印散見於各種紀要（日本大學的「紀要」，相當於中國大學的「學報」）、雜誌（不包括專業雜誌）和論文集中的論文，有點類似中國人民大學的《複印報刊資料》。該書從1964年開始每年出版一次，各分冊都是厚厚的一本（其中《文學·語學》分為上、下、增三冊），對專業研究者用處頗大，可惜每次只印180套，在中國一般見不到。

¹⁴⁴ 衣川賢次：《禪宗語錄導讀》（1）。載於日本《俗語言研究》，1994。

《橫濱市立大學論叢》、《橫濱市立大學紀要》、《神戶外大論叢》等刊物，發表了大量漢語史研究論文，同樣功不可沒。

二、

由於日語在詞匯、音韻、文字諸方面都深受漢語的影響，因此通過比較等手段研究漢語和日語的歷史和現狀，有助於解決訓詁學研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日語中的漢語詞匯大多源自漢語，有些尚保留著中古近代漢語的詞義及詞形，但因為年代久遠，有不少詞匯之源流以及確切含義卻往往不為人所察。如「退嬰」一詞，《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詞典》、《中文大辭典》等均未收錄，《漢語大詞典》收有該詞，釋義如下：語出《老子》：「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王弼注：「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嬰，一本作「櫻」。後以「退嬰」謂像嬰兒一樣柔弱無爭。含貶義。魯迅《集外集拾遺·《新俄畫選》小引》：「排外則易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於退嬰，所以後來，藝術遂見衰落。」聶紺弩《魯迅——思想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宣導者》：「別的革命者的思想，往往局限於一定的時期，一定的境界，時過境遷，就褪色，退嬰，乃至消失。」¹⁴⁵岑麒祥《漢語外來詞詞典》則認為「退嬰」一詞源出日語，系「退縮、保守」之義。

¹⁴⁵ 參見《漢語大詞典》第10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頁845。

「退嬰」在日語中屬常用詞，任何一種日本國語辭典或日漢詞典均予收列。小學館《日本國語大辭典》將「退嬰」釋為「倒退，閉居不出，毫無積極進取之心」。藤堂明保《學研漢和大字典》專門對「嬰」字作了解釋：圍繞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出其外。《新明解國語辭典》注明「嬰」之義為「守」。據此，「退嬰」之「嬰」並非指「嬰兒」，而應該是動詞，意為「環繞」或「保守」。但實際上「退嬰」並非日人據漢語之義創造的和制漢語，而是至遲出現于宋代的漢語詞匯。范浚《香溪集·徐忠壯傳》云：「徽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眾，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敵攻不已，眾蟻登。」¹⁴⁶此乃「退嬰」之詞源所在。「退嬰」之「嬰」實為「嬰城」之略，乃「以城自繞」之謂。又由於「嬰城」之意在乎「守」，故「退嬰」之「嬰」之「嬰」尚可理解為「嬰守」。¹⁴⁷

從音韻學角度來考察，日語漢字音讀與中古近代漢語音韻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在日本及中國學者所發表的大量音韻學論著中，有許多內容涉及日語漢字音讀與中古近代漢語音韻的比較研究，如城田俊的《中

¹⁴⁶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 1986），頁171。

¹⁴⁷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23-229。

古漢語音韻論》¹⁴⁸、高松政雄的《日本漢字音概論》¹⁴⁹和《日本漢字音論究》¹⁵⁰、築島裕所編的《日本漢字音史論輯》¹⁵¹、沼本克明的《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¹⁵²、真武直的《日華漢語音韻論考》¹⁵³、岡本勳的《日本漢字音の比較音韻史的研究》¹⁵⁴、張升餘的《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¹⁵⁵、丁鋒的《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¹⁵⁶、李無未的《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語上古音關係的研究》¹⁵⁷、《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語中古音關係的研究》¹⁵⁸和《日本學者對日語漢字音與漢語近代音關係研究》¹⁵⁹、李無未、陳珊珊的《日本學者對“聲明”與漢字音

148 城田俊：《中古漢語音韻論》（東京：風間書房，1981）。

149 高松政雄：《日本漢字音概論》（東京：風間書房，1986）。

150 高松政雄：《日本漢字音論究》（東京：風間書房，1997）。

151 築島裕編：《日本漢字音史論輯》（東京：汲古書院，1995）。

152 沼本克明：《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

153 真武直：《日華漢語音韻論考》（東京：櫻楓社，1969）。

154 岡本勳：《日本漢字音の比較音韻史的研究》（東京：櫻楓社，1991）。

155 張升餘：《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8）。

156 丁鋒：《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157 李無未：《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語上古音關係的研究》。《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158 李無未：《日本學者對日本漢字音與漢語中古音關係的研究》。《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159 李無未：《日本學者對日語漢字音與漢語近代音關係研究》載於李無未：《音韻文獻與音韻學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聲調關係的考訂》¹⁶⁰等。此外，朝鮮漢字音、越南漢字音與中古近代漢語音韻以及日本漢字音的關係同樣非常密切，日本和中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如上文提及的河野六郎的《朝鮮漢字音の研究》、三根谷徹的《越南漢字音の研究》和《中古漢字音と越南漢字音》，以及小倉進平的《增訂朝鮮語學史》¹⁶¹、崔羲秀的《朝鮮漢字音研究》¹⁶²、成元慶的《韓國字音與中國聲韻之關係》¹⁶³、橋本萬太郎的《朝鮮漢字音と中古中國語高口蓋韻尾》等。

日漢對音資料是用漢字及其所具有的發音對應性地記錄日語，包括句子、短語、單詞、漢字和假名發音的歷史語料。日漢對音資料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漢語與日本本島語言相關的，一類是漢語與日本琉球群島語言相關的。就語言譜系而言，二者都是漢語（包括漢語各方言）與日語（包括日語各方言）相對應的材料。日漢對音文獻現存20多種，系中日學者研究漢語音韻史和古代日語的寶貴資料。¹⁶⁴

將日語漢字讀音與漢語讀音進行比較研究，對於研究古漢語音韻及

¹⁶⁰ 李無未、陳珊珊：《日本學者對「聲明」與漢字音聲調關係的考訂》。《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2期。

¹⁶¹ 小倉進平：《增訂朝鮮語學史》（東京：刀江書院，1963）。

¹⁶² 崔羲秀：《朝鮮漢字音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6）。

¹⁶³ 成元慶：《韓國字音與中國聲韻之關係》（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

¹⁶⁴ 參見丁鋒：〈日漢對音漢語音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載於《漢語史學報》第五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其發展變化具有重要價值。由於日語漢字音讀中的語音來自中國歷史上不同的地區或時期，故又可分為吳音、漢音、唐宋音(又稱唐音或宋音)、現代音四種。吳音是日語漢字音讀中所占比例較高的讀音之一。日本政府於1981年10月公佈的新的《常用漢字表》收錄漢字1945個，共有音讀2187種，其中吳音占37.8%。吳音是從中國南北朝時期的江南地區通過朝鮮半島傳至日本的。《切韻》雖成書於601年的隋代，但它是對西元400 - 600年前後的中古漢語音韻的前期音的總結，其中吳音占相當大的比重，故6世紀之前傳到日本的吳音的許多音韻規律可以從《切韻》中找出。吳音在日本主要用於佛教誦經，所以現代日語中的佛教用語大多為吳音，如殺生(せつしよう)、經文(きようもん)、修行(しゅぎょう)、六根清淨(ろっこんしょうじょう)等。此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名也有吳音讀音。隋唐乃古代中日兩國交流的鼎盛時期，人員往來頻繁，當時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中原音傳到了日本，對日語漢字音讀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有了漢音。由於日本朝廷的大力提倡，漢音得以較為迅速地推廣。到了後來，漢音和吳音有了較為明確的使用範圍和界限。798年的日本官方文書云：「用漢音，讀五經，明經之徒從之讀十三經也。如詩文雜書，吳漢雜用。佛書仍舊以吳音讀焉。」(築島裕：《國語的歷史》)成書於1008年的《廣韻》既參考了《切韻》，又收錄了隋唐時期的中原音韻，故許多漢音均可從《廣韻》中找出其對應關係。在《常用漢字表》中的2187種音讀中，漢音占54.7%，如街道(かいどう)、風情(ふぜい)、人數(にんず)、疾病(しつぺい)、

富貴(ふうき)等。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將日本音讀與《切韻》對照一下，就會發現吳音在聲母方面與《切韻》基本一致，而在韻母方面的差異甚大。與之相反，漢音在韻母方面與《切韻》大體相同，而在聲母方面則差距明顯。這一現象，對於我們研究中古漢語音韻的發展變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唐宋音(注：此處的「唐」乃指中國，而非唐朝)主要源於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原地區。由於漢音和吳音在日語音讀中的地位已很穩固，加上這一時期中日交流不如隋唐時期眾多，故唐宋音數量很少，在《常用漢字表》中僅有16例，占0.7%。唐宋音主要出現在禪宗語言和一些宋元明清時代出現的日常生活用語上，如和尚(おしょう)、扇子(せんす)、行宮(あんぐう)、南京(なんきん)、揚子江(ようすこう)等。由於唐宋音出現的年代不同，故其讀音也不盡一致，如「提燈」一詞是宋代傳至日本的，念成「ちようちん」；而「行燈」一詞則是明清時期傳過去的，所以讀為「あんでん」。不過這樣的音為數不多。現代音則是近百年來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詞匯的讀音，其中有不少中國各地的方言。¹⁶⁵

值得重視的是，沼本克明在其力作《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¹⁶⁶中，通過系統分析並歸納各個時代的漢字音資料，首次提出與日語「漢音」

¹⁶⁵ 參見成春有：《日語漢字音讀研究》(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

¹⁶⁶ 沼本克明：《日本漢字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

相一致的音系是《慧琳音義》，而不是一般所認為的《切韻》。日本漢語史學界對沼本克明的這一重要研究成果評價甚高。此外，他依據平安時代經典古抄本上用假名所注的漢字音編制的《吳音·漢音分韻表》，乃研究漢語音韻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從文字學角度而言，由於中日兩國所使用的漢字大致相同，故可比性更強。漢字傳入日本後，被日語借用，有揚有棄，一直使用到今天。日語中的漢字與漢語中的漢字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如日語漢字中的簡化字、俗字及日本國字。

日本的簡化字有些與中國相同，有些有點不同甚至差異很大。有許多簡化字粗粗一看以為是日人創建的，中日兩國出版的一些權威性辭書也是這麼認為的。其實不然，大多數日本簡化字都可以在中國歷代文獻中找到出處。在日本到處可見的「桜」字，《中華字海》曰：「桜：同『櫻』，字見日本《常用漢字表》。」¹⁶⁷其實，唐碑中「嬰」之草書楷化作「𦵑」¹⁶⁸，明代文徵明書法中「櫻」則為「桜」¹⁶⁹。又如「樣」，日本常用漢字作「様」，中國現行漢字為「樣」。《成化丁亥重刊改並

¹⁶⁷ 冷玉龍等：《中華字海》（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頁751。

¹⁶⁸ 《書法字典》（上海：上海書店，1985），頁116。

¹⁶⁹ 《書法字典》，頁272。

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木部》：「樣，辭兩切，櫟實也。」¹⁷⁰又《手部》：「𣎵，余尚切，式𣎵也。」¹⁷¹《重訂直音篇·木部》：「樣，同上(櫟)。」¹⁷²《同文通考》認為「樣」系倭俗訛字，¹⁷³也是不正確的。¹⁷⁴

丁鋒曾就所見中國古代字體方面的著述作過一個不完全的統計，指出：「日本《常用漢字表》中出現的特殊漢字有390多個既已出現於中國歷代文獻或屬於其類推情形，占總數的近九成。說明日語中的特殊漢字絕大多數是繼承中國原有形體的，而且多是有文獻可證，有時代可循的。從此可以體味到日本在檢討漢字，選擇形體的操作中，是非常尊重漢字的史實和非常重視漢字的傳承的。」¹⁷⁵

筆者認為，有些日本簡化字雖可從中國文獻中找到出處，但日方簡化時未必見到或參考了中方文獻，其中有巧合的情況。當然，筆者的這一看法建立在推斷的基礎上，尚未找到足夠的證據。

¹⁷⁰ (金)韓孝彥、韓道昭撰，(明)釋文儒、思遠文通刪補：《成化丁亥重刊改並五音類聚四聲篇海》，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2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002)，頁384。

¹⁷¹ 同前註，頁445。

¹⁷² (明)章黻：《重訂直音篇》，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231冊，頁144。

¹⁷³ 新井白石：《同文通考》，載於《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一卷(東京：雄山閣，1983)，頁293。

¹⁷⁴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頁158-160。

¹⁷⁵ 丁鋒：〈日本常用漢字特殊字形來源小考〉，「新世紀漢語史發展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杭州，2003，12)。

國字是日人根據漢字構形原理而創造的漢字，僅在日本一國使用，又稱為倭字、和字、和俗字、和制漢字、新字、皇朝造字、本邦製作字等。國字的造字法以會意居多，大體上可以分為下列5種情況：1、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素組合而成。漢字素乃有意義的最小漢字單位，中國的漢字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素構成的。受這種構字法的影響，日本國字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這種方法構成的，如「畑(はた)」、「峠(とうげ)」、「辻(つじ)」等。2、省略或簡化漢字素。省略漢字素造字法是在中國原有漢字的基礎上，省略一個漢字素，然後再對筆劃略作更動而構成的一個新字。如「勻(におう)」和「川(くん)」，是在漢字「韻」和「訓」的基礎上省略了「音」和「言」，再略作變化而成的。再者，漢字韻的異體字有勻、均、韻等，訓的異體字有川、訓、馴等，因而上述國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國漢字異體字的影響。另有簡化漢字素造字法。如「凧(たこ)」就是將風簡化為几，再與巾組合而成的，意思是風箏。「凧(こがらし)」、「凧(なぎ)」等也屬於這種情況。3、變換一個漢字素。如「禁(ふもと)」是由漢字麓變化而來的。麓與禁均表示山腳下的意思，其共同之處是上部的漢字素都是林。漢字麓乃形聲字，其漢字素是表音的。而禁則是會意字，其漢字素是起表意的。4、增加一個漢字素。如「築(やな)」是在漢字梁之上加了一個漢字素竹。梁的一個意思是表示橋。「築」是指捕魚的一種工具，就是在河中用木、竹等攔成一道籬笆，然後留出一個口子，讓魚只能從這個口子通過，在這個口子處可以用網捕魚。「築」

就是指這種用木或竹排成的籬笆，由於這種裝置是用竹子做的，而且又像橋一樣橫跨在河上，所以就用竹和梁組成了這個會意字。5、根據書體變化造字。日本人從書體演變的過程中得到啟示，創造了部分國字。如《古事記》中出現的國字「俣(また)」，就是從漢字俟派生出來的。此類國字原先都有漢字楷書的原形，後來在草書體書寫的過程中變形了，最後又由草書楷化成一個新字形，並被保留了下來。¹⁷⁶國字在增減、變換、拼合漢字構字部件等方面，往往較中國漢字造字法更獨具匠心。如「畑」的造字法即為會意，意思是旱田，以區別于水田。

菅原義三的《國字の字典》¹⁷⁷收有國字1,551個，但日本出版的權威性語文辭書所收之國字均未超過200，如《大漢和辭典》¹⁷⁸收有141字，《漢字百科大辭典》¹⁷⁹中的「國字一覽」共計170字。歷史上的《倭字考》、《國字考》、《異體字辨》和《同文通考》，分別收有國字168、119、89、81個。常用的國字就更少了，《常用漢字表》中僅有8個，占常用漢字的0.41%。在一些漢語辭書和日漢詞典中，由於不瞭解國字的確切含義，常有誤釋。如《常用漢字表》中的「峠」字，《中華字海》

¹⁷⁶ 參見李月松：《現代日語中的漢字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頁92-94。

¹⁷⁷ 菅原義三：《國字の字典》（東京：東京堂，1992）。

¹⁷⁸ 諸橋轍次主編：《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

¹⁷⁹ 佐藤喜代治：《漢字百科大辭典》（東京：明治書院，1996）。

云：「峠，同『卡』。」¹⁸⁰這一釋義與「峠」字在日語中的含義相距甚遠。《漢語大詞典》：「卡，舊時在交通要道或險隘路口設兵守衛或設站收稅的處所。」¹⁸¹「卡」字是一個後起方言字，早見於《字彙補·葡部》：「楚屬關隘地方設兵立塘謂之守卡。」¹⁸²《中華字海》蓋拆「峠」字而釋，以為「峠」字由「上山下山」構成，路隘道險，正可設「卡」。事實上，目前所見漢語辭書及文獻未有「峠」字。《和爾雅·雜類·倭俗制字》：「峠，宜用嶺字。」《同文通考·國字》：「峠，トウゲ，嶺也。嶺，高山之可逾而過者也。」¹⁸³《倭字考·山部》：「峠，嶺。嶺，是山上，既上則宜下，故從山從上下，皇國會意之字。」¹⁸⁴《國字考·天地部》引《萬葉集》、《下學集》論，「峠」是指上山下山分道的山嶺，過往行人在此合手或折草向「道祖神」禮拜，以祈求旅途平安。¹⁸⁵王慶民曾指出：「比如『峠』，常被理解為『山頂、山顛』，1959年初版的《日漢辭典》裏也是這樣解釋的。其實這是不確切的。《新日漢

¹⁸⁰ 冷玉龍等：《中華字海》，頁442。

¹⁸¹ 《漢語大詞典》第1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頁987。

¹⁸² （清）吳任臣：《字彙補》（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20。

¹⁸³ 新井白石：《同文通考》，頁258。

¹⁸⁴ 岡本保孝：《倭字考》，載於《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九卷（東京：雄山閣，1983），頁171。

¹⁸⁵ 伴直方：《國字考》，載於《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九卷（東京：雄山閣，1983），頁69-70。

辭典》則糾正了這一誤解，解釋為『(山路的)最高處』。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沒有山路相通的山頂是不能稱為『峠』的。」¹⁸⁶可見，「卡」與「峠」的中日文化內涵相距甚遠。¹⁸⁷

「杵」也是國字，讀音為waku，本意是用細長的竹木製成的可張貼紙張、布帛等的框架，今多用於指限制、範圍。中國漢字中有「杵」字，讀音為zuo(陽平)，意思是柱子一端的樁頭。「杵」、「杵」屬於同一字之異體，但中日字義完全不同，「杵」也無來自漢語的音讀，可看作偶然與中國固有漢字同體的日本國字，造字遣義時也許參考過中國字書，也許沒有。「杵」的造字方法是將漢字固有部件機械合成，不屬會意，可稱作字素合成法造字。¹⁸⁸

俗字是相對於正字而言的。中國有俗字，日本也有俗字。日本俗字大體上可分為借用俗字、誤用俗字、訛俗字三大類。《同文通考》：「本朝俗書，務要簡便，凡字畫多者，或有借方音相近而字畫極少者以為用，其義蓋取假借而已，世儒概以為訛，亦非通論，今定以為借用。」¹⁸⁹「弁」、「若」、「厂」、「表」等均為日本俗字。弁、辨音相近，借作辨、辯

¹⁸⁶ 參見王慶民：〈關於日本「國字」〉：《日語學習》1981年第1期。

¹⁸⁷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47。

¹⁸⁸ 參見丁鋒：〈日本常用漢字特殊字形來源小考〉，「新世紀漢語史發展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杭州，2003，12)。

¹⁸⁹ 新井白石：《同文通考》，頁275。

等字。若、弱音同，借作老弱之弱字。厂、雁，方音相近，借作雁字。表、佞方音相近，借作佞、裱等字。

《同文通考》云：「本朝俗書，凡字形近似，謬寫作他字者，錄於此，以為誤用。」¹⁹⁰所謂「誤用」，實際上也是異字同形，即字形相同而音義全異者。誤用俗字的形成，除極少數屬於另造新字外，大多與字形簡化、繁化或訛變有關。如「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分別為「假」、「癸」、「友」、「夏」、「閏」、「圖」、「蜀」、「養」之誤用俗字。又據《同文通考》：「本朝俗書，訛字極多，不勝盡載。今錄一二，注本字於下以發例，華俗所用，亦不贅焉。」¹⁹¹如「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分別系「休」、「弘」、「才」、「靈」、「氏」、「刈」、「梅」、「凶」之訛俗字。¹⁹²

三、

《篆隸萬象名義》、《新撰字鏡》、《倭名類聚抄》、《類聚名義抄》、《世俗字類抄》、《伊呂波字類鈔》、《倭玉篇》、《和爾雅》

¹⁹⁰ 同前註，頁278。

¹⁹¹ 同前註，頁287。

¹⁹² 參見何華珍：《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頁180-190。

等日本古辭書，《大漢和辭典》、《漢字語源辭典》、《廣漢和辭典》、《漢和大字典》（學研）、《詳解漢和大字典》、《日本國語大辭典》、《廣辭苑》、《大字典》、《大辭典》、《字源》、《新字源》、《角川大字源》、《國字の字典》、《難字解讀字典》等日本近現代辭書，以及《明清俗語辭書集成》、《唐話辭書類集》、《古辭書音義集成》、《古辭書研究資料叢刊》、《漢語文典叢書》、《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國語學大系》（文字）、《古訓點資料集》、《訓點語と訓點資料》叢刊、《今昔文字鏡》等，對於漢語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篆隸萬象名義》系日本弘法大師空海根據顧野王《玉篇》而編撰的，乃日本歷史上最早的字典，是研究文字、音韻、訓詁學的珍貴資料。今本《大廣益會玉篇》與日本所藏唐寫本原本《玉篇》殘卷（僅存原書的1/8左右）已相距甚遠，而《篆隸萬象名義》分部列字的情況與《玉篇》殘卷相合，所收16900多字也同顧野王《玉篇》相當，注文中訓釋文字的義項也基本相同，只是刪去了原書所引經傳及顧野王按語。此外在部分正文之上增加了篆書。編排體例與《玉篇》一致，均分為30卷，依542部編次，始一而終亥。《篆隸萬象名義》作為日人所撰的漢語中古字書，堪稱原本《玉篇》之濃縮，為後人窺見顧野王《玉篇》之原貌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參考。¹⁹³《篆隸萬象名義》注釋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

¹⁹³ 參見丁鋒：〈原本玉篇殘卷的版本源流及其與《篆隸萬象名義》的傳承關係〉，《熊本學園大學文學・言語學論集》第八卷第一號（2000，6）。

本面貌，其反切記錄了南北朝時期的語音狀況，在音韻學上很有價值。其義訓比《大廣益會玉篇》豐富得多，在訓詁學上亦頗有意義。誠如楊守敬所云：「若據此書校刻餉世，非唯出《廣益玉篇》上，直當一部顧氏原本《玉篇》可矣。唯鈔此書者草率之極，奪誤滿紙，此則不能不有待深于小學者理董焉。」¹⁹⁴《篆隸萬象名義》和《原本玉篇殘卷》¹⁹⁵均系日藏唐代傳寫本，字形大同小異，其中有大量相同的俗體、訛字，有助於考究寫卷文字。在這一方面，《篆隸萬象名義》與《龍龕手鏡》頗有相似之處。其中又有些文字同上古先秦文字密切相關相承，于隸古定字亦有助益。再則，該書對於研究漢字流變具有重要價值。《篆隸萬象名義》只有日本山城國高山寺所藏鳥羽永久二年（1114）之傳寫本，日本崇文院於1927年據以影印，收入《崇文叢書》第一輯。中華書局於1995年依據《崇文叢書》本縮印出版後，《篆隸萬象名義》已經逐步引起中國國內學者的重視，但無論是對該書的研究還是利用，都還遠遠不夠。

《新撰字鏡》的編撰年代推定為平安朝初期，即昌泰年間（898 - 901）。編撰者昌住乃南部學僧。現存本是1124年十二卷抄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完本。該書自「天部」至「連部」共計160部，凡20,940餘字。該書分部不按《說文》、《玉篇》之順序，而是依部首編排，同一部首內再根據「天象」、「人事」、「自然動植物」等分類，其中一部分又

¹⁹⁴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卷四。

¹⁹⁵ （梁）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以四聲排列，導致體例不夠統一。該書之注解收集義訓甚夥，其義訓大多來自玄應《一切經音義》、《玉篇》和《切韻》，同時還旁采諸字書以增益之，此外尚有少量日本義訓。「今為勘之，其正、俗等字有出於《集韻》、《龍龕手鑿》之外者。所列古文，亦有出於《說文》、《玉篇》之外者。蓋昌住當日本右文之時，多見古小學書，（觀《見在書目》可證）不第《玉篇》、《切韻》皆顧、陸原本也。」¹⁹⁶《新撰字鏡》以及釋源順的《倭名類聚抄》（約成書於931 - 938）、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鈔》（成書於991年）、釋信瑞的《淨土三部經音義》（成書於1235）等，均採用了《玉篇》的釋義，對研究《玉篇》頗有價值。

具平親王編撰的《弘決外典鈔》除了採用《玉篇》的釋義外，還引用了《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顧愷之《啟蒙記通玄》、賈大隱《老子疏》、周弘正《莊子疏》、劉炫《孝經述議》等罕見中國古籍的資料，值得重視。釋信瑞的《淨土三部經音義》中的「三部經」是指《無量壽觀經》、《觀無量壽經》和《阿彌陀經》，該書所引的《東宮切韻》（早已亡佚）載有曹憲、陸法言、孫愐、王仁煦、麻杲、薛峴、郭知玄、祝尚丘、孫佑、韓知十、武玄之、裴務齊、沙門清澈等之說，彌足珍貴。

影響甚大的《倭名類聚抄》（又名《和名類聚抄》，簡稱《倭名抄》或《順倭名》）系漢學家釋源順在承平年間（931 - 938）編成。該書以漢字立條目，採用天、地、水、歲、時等部首分類，同一個「部」內又

¹⁹⁶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卷四。

分「門」，所以稱作「類聚」。書中的每個詞條除了注音、釋義以外，還附有出處。該書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收入了為數不少的俗語詞、口語詞。

《類聚名義抄》乃成書於11、12世紀的漢日詞典，系法相宗學僧所撰。書名中的「類聚」和「名義」系參照《倭名類聚抄》和《篆隸萬象名義》，部首分類則基本上根據《玉篇》。該書收錄漢字的正體和俗體，並將和訓注於其下。各部之下，名義可以相附者，即匯入其中，在這方面有點像類書。《類聚名義抄》「雖稍涉龐雜，然古文奇字賴之以考見者正復不少，固不得以《說文》等書律之也」¹⁹⁷。名古屋女子大學原教授草川升所編的《五本對照類聚名義抄和訓集成》，已由日本汲古書院出版。全書共分4卷，收錄圖書寮本、觀智院本、蓮成院本（鎮國守國神社藏本）、高山寺本、西念寺本等5種版本的《類聚名義抄》中的和訓，共計63,661條。該書對於中古漢語音韻及詞匯等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倭玉篇》系《倭譯大廣益會玉篇》之簡稱，研究者對其成書年代有不同看法，大多依據現存最古本推定為延德三年（1491），也就是室町時代初期。《倭玉篇》在當時的日漢詞典中具有代表性。其詞條根據《玉篇》的部首排列。由於版本不同，最多的分為542部，最少的僅有100部。詞條注釋採用「訓讀法」，收入了大量流行語，從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此前詞典中「訓讀」不足部分。北恭昭所編的《《倭玉篇》五本

¹⁹⁷ 同前註。

和訓集成》，已由日本汲古書院出版。該書共計3冊，其中《本文篇》1冊，收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室町中期寫本《拾篇目集》、大東急紀念文庫藏享祿五年（1532）寫本《玉篇略》、米澤市立圖書館藏室町後期寫本《倭玉篇》、大東急紀念文庫藏弘治二年（1556）寫本《倭玉篇》、大東急紀念文庫藏大永四年（1524）寫本《《玉篇》要略集》等5種不同版本的《倭玉篇》，另有《索引篇》分上、下兩冊，乃詳細的和訓索引，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

日本近現代文獻學泰斗長澤規矩也所編的《明清俗語辭書集成》¹⁹⁸，系從日本公私庋藏的中國古籍中精選有關書籍二十種彙編而成，是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參考書。《集成》所收的各種刻本中，有稀見的善本，即使屬晚清刻本，亦大多是流傳不廣的私家刻本或仿刻本，明清以降的版本目錄書中也罕見著錄。為了使國內有關學者有機會利用這部極有價值的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9年影印出版了該書。在影印之前，對其中佚名的明刊本《目前集》，竟得了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明趙南星撰《味檠齋遺書》，此書系清光緒中高邑趙氏刊本，其中《目前集》的卷目及版本與日本影印本完全一致，蓋光緒時用明舊雕版重印，上海古籍版乃據以補齊《題詞》和殘頁，對版面不清者亦大多予以更換。同時，又據《中國叢書綜錄》多處著錄及《味檠齋遺書》，確認《目前集》作者系明人趙南星。再則，《通俗常言疏證》亦以較清晰的同一版本對

¹⁹⁸ 長澤規矩也編：《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4）。

各卷文字模糊者抽換60餘頁。它如《裏語征實》、《直語補正》等書的個別地方，也參照同類藏本作修補。此外，為了便於查檢，書後增附了四角號碼索引。筆者認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汲古書院版《明清俗語辭書集成》這一事例，充分體現了中日兩國的訓詁學研究資料通過交流，可以取長補短、互通有無，從而相得益彰、同受沾溉，其促進雙方訓詁學研究的繁榮與發展之功為兩國學人所共慶。

在江戶時代，日本的「唐話學」（「唐話」即當時的漢語）發展很快，學習及研究漢語的人甚多，出現了一大批漢語辭書及讀本、課本。這些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俗語、方言等情況，乃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資料。日本古典研究會編、長澤規矩也解題的《唐話辭書類集》¹⁹⁹，集中收錄了這類書籍，其中包括不少寫本及稀見本。《唐話辭書類集》分為20集，收錄《唐話類纂》、《胡言漢語》、《怯裏馬赤》、《語錄譯義》、《唐話為文箋》、《忠義《水滸傳》解》、《忠義《水滸傳》鈔譯》、《《水滸傳》批評解》、《而言解》、《色香歌》、《劇語審譯》、《唐人問書》、《崎港聞見錄》、《南山考講記》、《常話方語》、《唐話纂要六卷》、《唐音雅穀語類五卷》、《唐譯便覽五卷》、《唐話使用六卷》、《兩國譯通》、《唐音和解》、《唐音世語》、《語錄字義》、《宗門方語》、《碧岩錄方語解》、《八仙卓燕式記》、《徒

¹⁹⁹ 日本古典研究會編、長澤規矩也解題：《唐話辭書類集》（東京：汲古書院，1971 - 1976）。

杠字彙》、《俗語解》、《俗語解》（靜嘉堂本）、《明律考》、《應氏六帖》、《《水滸傳》譯解》、《忠義《水滸傳》》（語解）、《忠義《水滸傳》》（語釋）、《《水滸傳》字彙外集》、《公武官職稱名考》、《詞略》、《奇字抄錄》、《雜纂譯解》、《字海便覽》、《小說字彙》、《訓義抄錄》、《支那小說字解》、《中夏俗語藪》、《漢字和訓》、《授幼難字訓》、《學語編》、《粗幼略記》、《華語詳譯》、《官府文字譯義》、《俗語譯義》、《游焉社常談》、《華學圈套》、《（崎陽照照子先生）譯通類略》、《譯通類略》、《譯官雜字簿》、《滿漢瑣語》、《雜字類譯》、《中華十五省》、《譯家必備》、《《水滸傳》記聞》、《《水滸傳》記抄解》等63部辭書，為研究近代漢語提供了很大便利。

松井利彥所著的《近代漢語辭書の成立と展開》²⁰⁰，包括“近世節用集の性格”、“近世節用集の變容”、“譯語辭書の成立”、“譯語辭書の成長”、“譯書讀解辭書の背景”、“新聞用語辭典の成立”、“漢語辭書の成立と成長”、“漢語辭書の系譜”、“漢語辭書の充實”、“明治初期の漢字音”、“明治初期の漢字”等章節。

築島裕主編的《古辭書音義集成》²⁰¹，包括奈良時代（710 - 784）寫本《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平安時代（784 - 1192）初期寫本

²⁰⁰ 松井利彥：《近代漢語辭書の成立と展開》（東京：笠間書院，1990）。

²⁰¹ 築島裕主編：《古辭書音義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8 - 1981）。

《四分律音義》、平安時代初期寫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院政時期(1086 - 1205)寫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石山寺藏本《《大般若經》字抄》、平安時代中期寫本《妙法蓮華經釋文》、南北朝時期(1336 - 1392)寫本《《法華經》音義》、室町時代(1333 - 1603)寫本《《法華經》音義》(永和(1375 - 1379年)本)、室町時代寫本《《法華經》音義》(永正十七年(1520)本)、鎌倉時代(1192 - 1333)寫本《字鏡》(世尊寺本)、大治三年(1128)寫本《一切經音義》、天永二年(1111)寫本《《孔雀經》音義》、承曆三年(1079)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義》、平安時代末期寫本《香藥字抄》、學習院大學藏本《伊呂波字類抄》、室町時代寫本《音訓篇立》、東急文庫藏本《《孔雀經》單字》以及島田友啟編的《字鏡索引》、沼本克明編的《一切經音義索引》、山口明穗等編的《音訓篇立索引》等書，乃從事漢語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木村晟所編的《古辭書研究資料叢刊》²⁰²共分31卷，收錄《聚分韻略》、《平他字類抄》、《文鳳抄》(含古寫本二種)、《色葉字平它》、《色葉集》、《伊露葩字》、《新韻集》、《和訓押韻》、《韻字記》、《漢和三五韻》、《和漢新撰下學集》、《法花文句難字書》、《《法華經》文字聲韻音訓篇集》、《新撰類聚往來》、《延命字學集》、《節用殘簡》、《快言抄》、《(雅言俗語)俳諧翌檜》、《假名文字遣》

²⁰² 木村晟編：《古辭書研究資料叢刊》(東京：大空社，1995 - 1997)。

(含天正六年寫本和無刊記本)、《運步色葉集》、《日本一鑒》、《方言類釋》、《幼學指南抄》、《類字源語抄》、《續源語類字抄》、《古節用篇(和名集)》、《北野天滿宮藏佚名古辭書》、《萬葉類葉抄》、《連歌至寶抄》、《要略字類抄》、《略韻》、《童蒙頌韻》、《伊呂波韻》、《和語韻略》、《和歌初學抄》、《八雲禦抄》、《藻鹽草》、《國籍類書字書》、《字書(名匯)》、《詞葉新雅》等41種日本珍貴古辭書，對於訓詁學研究者而言也是難得的參考文獻。

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部國語學講座編的《北大國語學講座二十周年紀念論輯：辭書·音義》，內含池田證壽的《關於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與先行音義的關係》、宮澤俊雅的《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と法華音訓》、築島裕的《關於《法華經》單字的和訓》、池田證壽等的《法華釋文並類聚名義抄引慈恩釋對照表》、石塚晴通的《唐招提寺本孔雀經音義》等論文，可供漢語史研究者參考。同時，日本天理圖書館編的《日本の古辭書》以及川瀨一馬著的《古辭書の研究》，亦可供中國學者參考。此外，宮澤俊雅尚有《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と《妙法蓮華經》釋文》、《關於《妙法蓮華經》釋文的初稿與改訂》等論文。

吉川幸次郎、小島憲之、戶川芳郎編，日本汲古書院出版的《漢語文典叢書》，包括荻生徂徠的《訓譯示蒙》、伊藤東涯的《助字考》、岡白駒的《助辭譯通》、釋大典的《詩語解》、《文語解》和《詩家推敲》、皆川淇園的《助字詳解》、河北景楨的《助字鵠》、三宅橘園的《助語審象》、東條一堂的《助辭新譯》、北條霞亭的《助字辨》、釋介石的《助字彙》、荻生徂徠的《譯文筌蹄初編》、《譯文筌蹄後編》和《譯文筌蹄寫本》、青山居士的《譯文筌蹄字引》、太宰春台的《倭

讀要領》、皆川淇園的《虛字詳解刊寫本》、伊藤東涯的《操觚字訣》和《用字格》、皆川淇園的《實字解》、三好似山的《廣益助語辭》、松井河樂的《語助譯辭》、松本愚山的《譯文須知虛字·實字》、皆川淇園的《《史記》助字法》、《《左傳》助字法》和《《詩經》助字法》，對於研究漢語語法史具有重要價值。

上文提及的杉本つとむ所編的《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共計18卷，包括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中根元圭的《異體字弁》²⁰³、雲石堂寂本的《異字篇》、洛東隱士的《正俗字例》、一心院響譽的《刊謬正俗字弁》、太宰春台的《倭楷正訛》、田中道齋的《道齋隨筆》、岩倉傢俱的《楷林》、湖東布山的《俗書正訛》、松本愚山的《省文纂考》、宇田有齋的《正楷字覽》、松本峨山的《古今字樣考》、水井勝山的《疑字貫雙》、萩原秋岩的《別體字類》、小此木觀海的《楷法辨體》、長梅外的《古今異字叢》、竹內某的《異體字匯》、近藤西涯的《正楷錄》、石野恒山的《拔萃正俗字弁》、岡本況齋的《古今文字》、岡本況齋的《古今字樣》、中山竹之進的《古字便覽》、《別體字考》(編者不詳)、山本格安的《和字正俗通》、伴直方的《國字考》、岡本況齋的《倭字考》、比丘円一の《瑣玉集》、《小野篁歌字盡》(編者不詳)、戀川春町の《廓憲費字盡》、式亭三馬《小野篁謔字盡》、《異體同字編》

²⁰³ 杉本つとむ所編著：《異體字弁的研究及其索引》(日本文化書房博文社，1972年)，可供參考。

(編者不詳)、狩谷棧齋的《(和名類聚抄箋注)異體字弁》、黑柳勳的《俗字略字》、《下學集》(元和三年版,編者不詳)、《節用集》(易林本小山版)(編者不詳)、市河米庵的《楷行薈編》、關子德等的《行書類纂》、源孺皮的《漢篆千字文》、木村正辭的《語彙書類》、龜田鵬齋的《國字考》、伴直方的《以呂波考》、伴信友的《假字の本末》、狩穀棧齋等的《古京遺文》等書,對於研究漢語中的異體字和俗字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日本現當代所編的漢和詞典中,規模最大的當推諸橋轍次主編的《大漢和辭典》²⁰⁴。該書收單字48,900個(連補遺為49,964個),附有篆文10,100個,詞語526,500條,收錄插圖2,800幅。它以《康熙字典》為基礎,但加收了中國古代其他字書的字和一些日本國字。該書的編排是以單字帶複詞、成語,單字按部首排列,其下複詞以日語五十音順為序。附有筆劃、字音(按日文音序排列)、字訓(按日文字義排列)和四角號碼等4種索引。該書的字形以《康熙字典》為依據,並參考《說文解字》、《爾雅》、《玉篇》、《字彙》、《正字通》等古代字書,然後作出統一的決定。揭示篆書,慎重究明六書之本義。字義解釋以平易確

²⁰⁴ 諸橋轍次主編:《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960),精裝12冊,附索引1冊。1966-1968年出縮印本;1974年出修訂本;1984-1986年出最新修訂本。2000年又出版了《大漢和辭典補卷》。另有1990年出版的《大漢和辭典語彙索引》。

切為主，明標出處，舉應用實例，並究明音義通用文字的相互關係。同一文字有異體、俗體者亦加列舉。單字的注音包括日語假名、漢語注音符號、拉丁字母拼音，並標注聲調和《集韻》等韻書的反切以及韻部；有幾種音義的字，注音分列幾項，和釋義相對應。字頭之下還列有小篆、古文等書體。此外有「名乘」、「解字」和「參考」諸項。「名乘」項專門注明該漢字用作日本人名時的特殊讀法。「解字」項主要說明象形、指示、會意三種字的結構和本義，並闡述各種引申義發生的經過。「參考」項說明字形、字音、字義的疑義或異說等，除了補充本字釋義之未盡，還舉出字形類似易誤的字，並辨其異同。該書乃目前規模最大的以漢文為主的大辭典，雖用日文解釋，但它以漢字為詞頭，徵引材料主要來自中國古籍，故可作為漢語詞典使用。該書徵引資料廣博，收錄了大量一般辭書查不到的字詞，包括人名、別號、地名、年號、官名、書名、稱謂、成語、典故、格言、俗語以及普通詞語、專科術語等等，在訓詁學研究中十分有用。編纂《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時，均將《大漢和辭典》列為重要參考書之一。當然，該書在徵引材料等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處。

四、

《篇佚文補正漢字索引》等，均系從事訓詁學研究的重要工具書。近年來出版的石川重雄編制的《宋元釋語語彙索引》、川島鬱夫編制的

《《元曲選外編》語彙索引》、渡邊洋編制的《《劉知遠諸宮調》語彙索引》、大島吉郎《《紅樓》日本漢學界》對中國古籍索引非常重視，結合有關學術研究編制了大量中國古籍索引。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出版的中國古籍索引約占世界各地所出版的全部中國古籍索引的80%，僅唐代文學古籍索引就達38種，其對中國古籍索引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這是日本學者在中國古籍整理研究領域最突出的成果。²⁰⁵

日本編制的中國古籍索引門類繁多，幾乎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其中許多索引對訓詁學研究幫助甚大，如斯波六郎等編制的《文選索引》、太田辰夫編制的《《敦煌變文集》口語語彙索引》、原田種成編制的《《搜神記》語彙索引》、飯田吉郎編制的《元曲常用語彙索引》和《《董西廂》語彙引得》、東京文理大學漢文學第二研究室編制的《《還魂記》語彙引得》、太田辰夫編制的《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語彙索引》、古屋二夫編制的《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語彙索引》、鳥居久靖編制的《《瓶外卮言》語彙索引》和《古謠諺語索引》（合編）、佐藤仁編制的《《朱子語類》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語彙索引》、鹽見邦彥編制的《《朱子語類》口語語彙索引》、西岡弘編制的《《遊仙窟》索引》、大島仲太郎編制的《《妙法蓮華經》索引》、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編制的《《法華經》一字索引》²⁰⁶和《《維

²⁰⁵ 參見陳東輝：〈試論日本所編的中國古籍索引〉，《文獻》2005年第2期。

²⁰⁶ 一字索引即逐字索引，日本一般稱為一字索引。

摩詰經》、《勝鬘經》一字索引》、柳田聖山編制的《《祖堂集》索引》、太田辰夫編制的《《祖堂集》口語語彙索引》、山田孝雄編制的《玄應一切經音義索引》、神尾壹春編制的《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索引》、山田利明等編制的《《太上洞淵神咒經》語彙索引》、玄幸子編制的《口語語彙資料七種綜合索引》、藤田至善編制的《《後漢書》語彙集成》、小野川秀美編制的《金史語彙集成》、田村實造編制的《元史語彙集成》等。波多野太郎在中國古籍索引編制領域亦功績卓著。他編制的《中國小說戲曲詞匯研究辭典·綜合索引篇》，是對在日本德川時代、明治年間到昭和時代編印的有關中國小說戲曲資料的語彙綜合索引。該索引詳注出處，檢索方便，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和訓詁學極有用處，是一部高質量的工具書。《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彙編》(第1-9編)亦系波多野太郎所編。該書將中國地方誌中有關方言的部分加以彙編影印，每編卷末附有該編所收方言詞匯的索引。卷首有一導言，敘述方志中所錄方言詞匯的語言學價值。該書將有關方言資料按地區彙聚在一起，並編制了索引，檢索方便，故可作為一部語詞索引來使用。該書對於漢語方言研究及辭書編纂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近年由日本魏書研究會編制的《《魏書》語彙索引》，耗時近30年，精裝一巨冊，採錄(北齊)魏收撰《魏書》中的人名、地名、王朝名、民族名、書名等固有名詞，官職、法律、儀禮等與制度有關的用語，與政治和社會經濟有關的重要用語，動植物名、器物名、自然現象、人物評價等，以及屬於普通名詞的用語編制成索引，為中古漢語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大阪市立大學明清文學言語研究會

編制了一套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語彙索引，包括《《紅樓夢》語彙索引》、《《金瓶梅》語彙索引》、《《水滸》全傳語彙索引》、《《儒林外史》語彙索引》、《《兒女英雄傳》語彙索引》和《中國古典戲曲語彙索引》等6種，對研究近代漢語甚有助益。它如入矢義高編制的《通俗編·直語補證·恒言錄·方言藻·爾雅綜合索引》、西端幸雄編制的《《玉篇》零卷出典索引》和《原本《玉篇》零卷、玉夢》語彙索引》和《容與堂本《水滸傳》語彙索引》等，在從事近代漢語研究時也頗有用處。此外，日本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編制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索引》，規模宏大，乃研究佛經詞匯的重要工具書。

此外，日本還出版了一些中國古籍專書詞典。如辛島靜志編纂的《《正法華經》詞典》，收入了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中佛教詞、音寫詞、口語詞等為中心的4千多條詞語。在每個條目中，除了詳細標明該詞條出自《正法華經》（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卷）第幾頁第幾段第幾行外，還注明了該詞條的現代漢語拼音和英語翻譯，在《漢語大詞典》和《大漢和辭典》中的頁碼以及最早的書證，並且附上了梵本《正法華經》（Kern-Nanjio校刊本及中亞出土寫本）以及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卷）中的對應詞。此後，辛島靜志又編纂了《《妙法蓮華經》詞典》，體例與《《正法華經》詞典》相同。作者還將繼續編纂其他漢譯佛典的詞典，最終將它們匯總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譯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上述帶有索引性質的詞典對於佛經詞匯及中古漢語研究非常有用。

五、

眾所周知，日本藏有大量中國古籍，內含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善本近9千種，僅唐人寫本就有至少32種。²⁰⁷其中有不少典籍已在中土亡佚，彌足珍視。這些典籍大多直接或間接與訓詁學研究有關。如晚清光緒年間黎庶昌和楊守敬從日本輯刻的《古逸叢書》，收錄了多種在中土失傳已久的逸書。其中的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是我國第一部以楷書為正體的字書，釋義完備、例證豐富，詞義不明的，還有顧野王按語，並賴以保存了多種亡佚已久之書，宜倍加珍視²⁰⁸；《韻鏡》是現存韻圖中最古老的一種，至今仍是音韻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此外，《古逸叢書》中還有多種日本收藏而中國罕見的隋唐寫本和宋元刻本。內中的影宋蜀大字本《爾雅》，乃現存《爾雅》單注本中一個較早的本子，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覆宋本重修《廣韻》和覆元泰定本《廣韻》，為考究《廣韻》的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據，在音韻學和校勘學上亦很有參考價值。

《集韻》現存三種宋刻本，一是南宋初年明州(今浙江寧波)所刊，

²⁰⁷ 參見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²⁰⁸ 朱葆華所著的《原本玉篇文字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對原本《玉篇》中的合併字、新增字、異體字和常用字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考察，乃關於原本《玉篇》研究的首部專著，從該書中可以較為充分地瞭解原本《玉篇》之價值。

經南宋中期修補印行的本子，是《集韻》傳世最早的刊本，也是清代以來通行諸本的祖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3年影印出版。二是南宋孝宗時湖南刻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收入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出版的《古逸叢書三編》中。三是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今陝西安康）軍刻本，藏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該本以蜀本為底本，校之以中原舊本，並用《說文》、《爾雅》等書糾謬。由於該本深藏於日本皇宮，故中國國內學者長期以來僅能依據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諸書方可窺其一斑，卻少有睹其全貌者，以致對它產生種種猜測和誤解。其中之一便是認為國圖與宮內廳的兩個本子系《集韻》的同一重刻本。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金州本和湖南本均刊刻于南宋孝宗年間，而兩本行款格式又大致相同。但經過仔細考辨，可斷定金州本和湖南本絕非同一版本。日本宮內廳所藏金州軍刻本的價值，除了在於它是不同于通行本系統的一個詳加校訂的宋刻本之外，還在於它有保存完好的牒文、銜名和跋文，為後人提供了關於《集韻》一書的寶貴歷史資料。它清楚地表明瞭《集韻》的編撰及刊刻年代，可糾《四庫全書總目》之誤，尚可補由於其他版本牒文殘缺而造成的《集韻》成書及刊刻問題不詳之遺憾。它還顯示《集韻》的宋刻本除我們所知的之外，尚有蜀本、中原本等，只是與慶曆原刊同樣不存於世了。令人遺憾的是，現存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集韻》金州軍刻本已非完璧，缺首卷，僅存二

至十卷。該書已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一輯)，由中國線裝書局於2001年據原版縮小影印。²⁰⁹

中國大陸所藏的《大宋重修廣韻》之宋刻本，僅有國家圖書館的宋紹興年間殘本3卷，然而日本卻保存了該書的宋刻本6種(全本5種，殘本1種)，其中國會圖書館藏有宋光宗(1190-1194)、宋甯宗(1195-1224)時代臨安刻本《大宋重修廣韻》5卷，宮內廳書陵部、靜嘉堂文庫和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宋甯宗年間(1195-1224)浙中覆宋孝宗時刻本《大宋重修廣韻》5卷，國家公文書館第一部(原內閣文庫)藏有宋乾道五年(1169)黃三八郎《巨宋廣韻》5卷，名古屋大須觀音(原真福寺)寶生院藏有北宋末期刻本《大宋重修廣韻》殘本1卷²¹⁰。同時，日本的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有宋末元初刻本《廣韻》5卷，日光輪王寺藏有金刻本《廣韻》5卷，天理圖書館藏有元延祐二年(1315)圓沙書院刻本《廣韻》5卷，國家公文書館藏有元覆宋刻本《大宋重修廣韻》殘本4卷(缺第1卷和第2、3卷首頁)，大谷大學悠然樓藏有元至順元年(1330)敏德堂刻本《廣韻》5卷，米澤市市立圖書館藏有元元統三年(1335)日新書堂刻本《廣韻》5卷，尊經閣文庫、靜嘉堂文庫和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刻

²⁰⁹ 參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一輯《集韻》(北京：線裝書局，2001)影印說明。

²¹⁰ 即5卷本中的第3卷，系現存最古之《廣韻》刻本。

本《廣韻》5卷，國家公文書館藏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山書院刻元至順庚午（1330）配補本《廣韻》5卷和元刻本《明本正誤足注《廣韻》》5卷，東洋文庫藏有元刻本《廣韻》5卷，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有元刻本《廣韻》殘本3卷（即5卷本中的第3、4、5卷，每卷首尾皆缺）。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京都高山寺、滋賀石山寺、東京大東急紀念文庫、京都大福光寺分別藏有唐人寫本《玉篇》殘本第9卷、第27卷之前半部、第27卷之後半部、第8卷「心部」之碎片、第24卷「魚部」之碎片，大阪杏雨書屋藏有唐人寫本《說文解字》殘卷（即「木部」188字），奈良正倉院藏有唐人寫本《一切經音義》殘本1卷（即第6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唐長壽三年（694）李元惠寫本《妙法蓮華經》7卷，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唐人寫本《妙法蓮華經》8卷，東京禦茶之水圖書館藏有唐人寫本《妙法蓮華經》殘本1卷（即7卷本中的第7卷），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有唐乾元二年（759）唐人寫本《妙法蓮華經》殘本1卷（即7卷本中的第3卷），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有宋一經堂刻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60卷和《附釋音《毛詩》注疏》20卷，名古屋大須觀音寶生院藏有宋刻本《禮部韻略》殘本3卷（即5卷本中的第1、3、5卷），²¹¹均為音韻學研究彌足珍貴之第一手資料。²¹²

²¹¹ 參見嚴紹盪：《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盪海外訪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²¹² 參見丁鋒：〈《大廣益會玉篇》刪改《玉篇》增補內容考——兼談各國所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魯國堯先生于1990年秋在東京從事合作研究時，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發現了《盧宗邁切韻法》這一宇內孤本。魯先生將宋代音韻學史作為廣闊的背景，對《盧宗邁切韻法》進行了深入而細緻的研究，撰成長達3萬字的論文。該文全面闡發了《盧宗邁切韻法》的學術價值，指出該書是宋代等韻學的一個派系的資料之彙集，不僅在漢語音韻學史上有珍貴的學術價值，而且也為漢語語音史提供了若干宋代的語音資料。²¹³

此外，在日本有「和刻本」這一名詞，其概念與「日本刻本」不同，一般是指日本刻印的中國漢籍。「和刻本」這一日本文獻學名詞在中國尚不通行。中國學界一般稱此類版本為「日本本」或「東洋本」。但近年來和刻本已逐漸引起中國學者的重視。《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王寶平主編）已由杭州大學出版社於1995年刊行，收錄中國內地68家圖書館所藏日本明治年間及明治以前刻印、抄寫的中國著者之書和日本著者的注校、研究中國古籍之書，大正、昭和時期的影印本亦間有收錄，其中「經部·小學類」收書118種，僅（唐）釋智廣撰《悉曇字記》一卷就有日本慶安元年（1648）刻本（有日本識語）、萬治三年（1660）刻本、寬文八年（1668）京都文政堂刻本、寬文九年（1669）平安書林

藏《玉篇》殘卷的版本問題》，日本《海外事情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號（2005）。

²¹³ 參見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中國語文》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

菊屋源兵衛刻本、文政年間（1818 - 1830）刻本、天保四年（1833）東叡山刻本等7種版本，以及日本中野宗左衛門刻本《悉曇字記指南鈔》六卷（日·釋佚名注）；關於《爾雅》的則有日本翻刻宋本《爾雅》三卷、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松崎氏羽澤石經山房影刻宋本《爾雅》三卷《音釋》三卷《校訛》一卷（日·松崎復校編）、日本影刻清嘉慶六年（1801）南城曾氏藝學軒影宋繪圖本《爾雅》三卷、日本文久二年（1862）積玉園刻本《爾雅注疏》十一卷、日本翻刻明萬曆本《爾雅注疏》十一卷等5種；關於《韻鏡》的有日本寬永十八年（1641）田原仁左衛門翻刻享祿宣賢本《韻鏡》一卷、日本翻刻宋慶元三年（1197）《韻鏡》一卷、日本銅駝坊書肆長尾平兵衛刻本《韻鏡》三卷《韻鏡遮中鈔》一卷等3種不同的版本，另外（日）釋宥朔撰《韻鏡開奩》六卷，同時還有日本寬永四年（1627）刻本和日本寬永四年刻萬治二年（1658）印本。經考證，《韻鏡》在宋淳祐十二年（1252）之前傳入日本。該書在日本流布甚廣，版本眾多，主要有寫本、刻本和活字本三大系統。除了上述版本之外，寫本較早的有建長四年（1252）明瞭房信範複寫本、元德二年（1332）本、嘉吉元年（1441）本、延德（1489 - 1491）識語本、文龜（1501 - 1503）本、天文十年（1547）和元龜（1570 - 1572）本；刻本較早的有享祿元年（1528）本、永祿七年（1564）本、慶長十三年（1608）本和寬永五年（1628）本等；活字本有慶長十三年（1608）古活字本以及覆刊本、整刊本等。日本寬永年間之後，《韻鏡》研究非常興盛，業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各種研究著作多達250餘種。《韻鏡》所代表

的漢語中古音系統的唐宋時代之語音，已逐漸被日語所吸收，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²¹⁴《韻鏡》作為《古逸叢書》之一種，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隨《古逸叢書》一同回歸故土。百餘年來，中國學者對該書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校勘方面，有龍宇純的《韻鏡校注》²¹⁵和李新魁的《韻鏡校證》²¹⁶。前者有校記838條，後者有校記1,219條。研究專著有孫仲溫的《韻鏡研究》²¹⁷。陳廣忠的《韻鏡通釋》²¹⁸作為通論性的研究著作，對《韻鏡》中涉及的所有問題進行了全面而又系統的詮釋。有關《韻鏡》研究的論文，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與《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的比較研究，對日本版本的研究，對重紐的研究，對時代的研究等等。²¹⁹中日學術交流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從《韻鏡》一書即可窺見一斑。同時，長澤規矩也編的《和刻本辭書字典集成》，包括《爾雅義疏》、《小爾雅》、《廣雅》、《方言》、《釋名》、《匡謬正俗》、《助語辭》、《連文釋義》、《虛字啟蒙》、《虛字注釋備

²¹⁴ 有關日本歷代學者研究《韻鏡》的成果，可參考[日]福永靜哉：《近世《韻鏡》研究史》，（東京：風間書房，1992）；李無未：〈日本學者的《韻鏡》研究〉：《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4期。

²¹⁵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

²¹⁶ 李新魁：《韻鏡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

²¹⁷ 孫仲溫：《韻鏡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7）。

²¹⁸ 陳廣忠：《韻鏡通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²¹⁹ 參見陳廣忠：〈《韻鏡》——古代音位理論的結晶（代序）〉，載於陳廣忠：《韻鏡通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卷首。

考》、《文字竅》、《方言藻》、《急就篇》、《大廣益會玉篇》、《字考》、《干祿字書》、《字彙》、《經傳釋詞》、《古音複字》、《續字彙補》、《字函》、《通雅》等22種和刻本辭書，對於漢語史研究亦頗有助益。再者，長澤規矩也還編有《和刻本經書集成》、《和刻本正史》、《和刻本正史別卷》、《和刻本諸子大成》、《和刻本漢籍隨筆集》、《和刻本類書集成》、《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和刻本明清資料集》等，也值得關注。²²⁰此外，像築島裕編的《長承本蒙求》、池田利夫編的《蒙求古注集成》等書，也為漢語史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由於和刻本與中國本土刻本往往有所不同，因而和刻本在漢語史研究中有時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穫。但由於條件所限等種種原因，和刻本尚未受到中國漢語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視。

²²⁰ 參見陳東輝：〈長澤規矩也與和刻本叢書〉，載於王勇主編：《中日關係史料與研究》第一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in Japan——Concurrently on the
Sino-Japanese Academic Exchanges have Positive Role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Dong-hui Chen

Abstract

Th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made much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ven surpass the Chinese scholars in some fields. These achievements extraordinary merits us attention and use for reference.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in Japan, as well as the Sino-Japanese academic exchanges have positive role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by five aspects, combine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for three years in the Chinese speciality of national Fukui university of Japan.

Keyword :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Chinese Phonology; Chinese Philology; Sinology in Japan; Sino-Japanese academic exchanges

(責任編輯 : 邱鈺倫 郭欣怡)

